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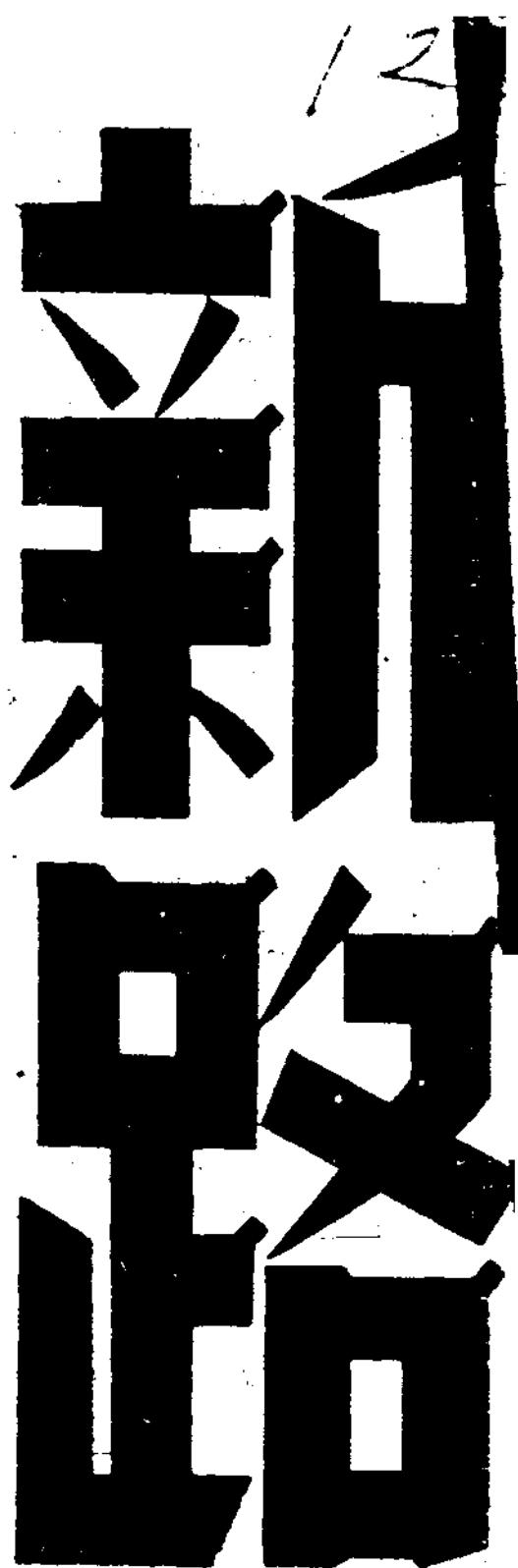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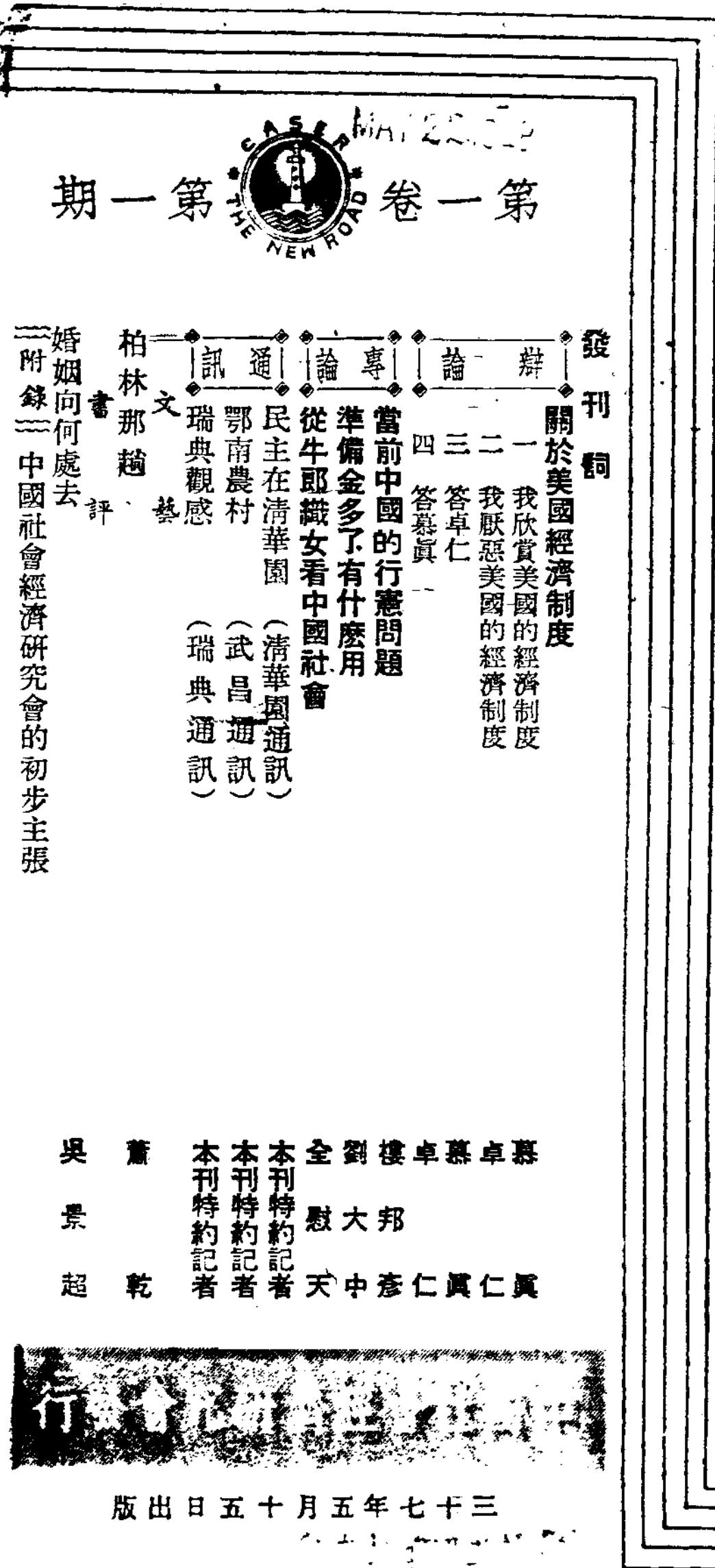
新路周刊 /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 — V. 1, no. 1
(民国37年[1948]5月) ~ [?] ; — 北平 : 编者[发
行者], 民国37年[1948]~[?].
; 26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2, no. 6 (1948, 5 ~ 12)



周刊
(創刊號)

609090

版出日五十年五月十五

● ● 發刊詞 ● ●

我們這個刊物，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主辦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會員大會中，對於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各問題，曾通過主張三十二條。（見本刊本期附錄）

這三十二條主張，表示我們一批朋友對於幾個重要問題的基本看法。我們所以作這種主張的理論根據，以及實現這些主張的辦法，乃是本刊以後所要討論的。

在此，我們要鄭重聲明的一點，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並非一個政黨的組織，所以這三十二條也並非黨綱。在一個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社會裡，一個團體，對於社會上許多重要的問題，有所主張，而又聲明其組織並非政黨，自然會引起許多人的懷疑。但是在憲政的社會裡，這是一件極其普通的事。有人統計，在華盛頓以他們的主張來影響國會的團體，起碼有五百個，但是他們確乎是無黨無派，並不附屬於任何政黨，那一個政黨的辦法，採納了他們的意見，他們就表同情於那一個政黨。這是在憲政之下，一般公民對於政黨所應採取的態度。我們以為：在真正的憲政之下，政黨的組織與活動，是必要的，但是從事政黨的活動，是一種專門的工作，不必每一個人都要參加，正如每個人不必都去當醫生，作律師一樣。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公民，對於每一問題，自然有我們的看法。把這種看法公開的說出來，是做公民的義務，也是做公民的權利。在我國將來真正實行憲政的時候，任何人的選舉票，前途究竟屬投那一黨的候選員，就要看那一黨採納了他的看法。所以一個團體，把自己的主張說出來，同時又說明自己不是政黨，實在是極為自然，極為合理的一種舉動。

其次，我們要說明的，就是我們所提出的三十二點，乃是我們以後討論中國各種問題的出發點，但不能看作我們大家所有意見的最後結晶。把我們的主張先寫出來，以後的討論才有所附麗，才不致空談無補，才不致漫無邊際。我們承認：社會是時刻在變動的，因而適應這些變動的主張與辦法，也不能固執不變。只有頑固的衛道者，以及偏執的宗教徒，才會死守他們的陳說與教條。我們對於目前的重要問題，一定要去虛心研究，想從事實中求得結論，而且還要不斷的從新的事實中，來試驗我們所作結論的正確性。我們自己不敢說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並不擺出包辦真理的面孔，凡是我們所提出的理論與事實，假如別人能以相反的理論與事實來批評我們的，我們都願意誠懇的，虛懷的與他商討。有人認為：思維矛盾的揭露，以及對立意見的衝突，是發現社會真理的最好方法。這是對的。我們願意在本刊中，提高討論的水準，以理論應付理論，以事實反駁事實，以科學方法，攻擊從偏見。但是我們這一班人，都不以罵人見長，所以凡是以謾罵來對付我們的，我們只有藏拙，不與計較。同時我們這一班人，也以剛毅自矢，凡想以武力來壓迫我們，要我們改變主張的，我們也決不低頭就範。

在萬方多難的今日，我們深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發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來探索中國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容有不同，並且可以不同到一個程度，可以和我們三十二條的初步主張牴觸；我們自己中間也一樣的可以彼此質難，互相辯駁，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動機是相同的，就是對於國家社會的種種事實與問題，想瞭解得更清楚，我們的態度也是一樣的，就是，刊物儘管由團體辦理，每一句的責任還是由每一個人自己負擔。我們相信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腳踏實地，不草率將事。我們希望全國人士，本同樣的動機與態度，給我們以道義上，精神上的各種協助，使我們的工作，可以發生最大的效用。

○○ 辯論 ○○

我們開這一欄的目的，是想利用這刊物的二分之幅，把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一齊都挑列出來，讓讀者可以根據兩方面的意見，下自己的結論。這是與宣傳處於對立的工作，因為宣傳是只看一方的舌頭的。在學校中辯論會的時候，參加的兩方，或正或反，每以抽籤決定。我們這一欄的作者，有時也要用這種辦法來決定。因此，作者所發表的意見，不一定能代表他個人的意見，這是本欄的文章所以採用筆名發表的原因。

編者 謹

關於美國經濟制度

- 一、我欣賞美國的經濟制度
- 二、美國的自由經濟會領導世界到什麼結果
- 三、答慕真
- 四、答卓仁

一 我 欣 賞 美 國 的 經 濟 制 度

慕 真

我欣賞美國的經濟制度，第一因為他的生產效率高。無論在農業，礦業，工業，或者交通業中，每一個工人的生產能力，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的工人。根據一九四七年的統計，美國的煤礦工人，每天可產煤五十二四噸，英國工人，每天只能產一・一〇噸，其餘如荷蘭、德國、法國、比國的工人，每天只能產煤一噸以下。美國的生產機構，從橫的方面看，他的效率沒有那個國家比得上他；從直的方面看，他是常在進步的，當以今年的成績，打破去年的成績。以農業的生產來說，如以一九一〇年為基期，其生產指數等於一百，一九四四年的生產指數，便等於一百九十八，幾乎加了一倍。我們再看美國工人在每一點鐘的時間內所生產的價值，如以一九四〇年的物價來表示他，則在一八五〇年為一角七分，一九〇〇年為三角五分，一九四〇年為七角四分，一九四四年為七角九分。這種高的生產效率，奠定了美國繁榮的物質基礎。

第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一個分權的經濟制度，而不是一個集權的經濟制度，這是人民經濟自由的最好保證。凡是權力，不問他是政治權也好，

經濟權也好，教育權也好，假如有集中或獨佔的現象，對於人民的自由，是最大的威脅。美國的生產單位，據第二次大戰前的調查，約在一千萬個至一千二百萬個之間。在這種經濟權分散的情形之下，任何一個資本家，不管他的勢力多大，也不能控制一個人的飯碗。在甲處工作，如感到不滿意，可以轉換到乙處工作，沒有人可以強迫他。美國人的選擇職業，因而是自由的，他不受別人的調度，不受他人的支配。還有一點，就是美國的生產單位，既然如此衆多，而且各自為政，所以生產的計劃，並不受一個中央權力機構的指揮。生產的進行，完全受價格機構的影響，生產者視價格的漲落，計算利潤的大小，而決定生產的途徑及數量。所以美國的生產機構，可以說是為消費者所支配，他的要求，是決定生產的動力。從這個角度看去，美國的經濟制度，可以說是最民主的，不像某種國家，把生產計劃，交給少數人去決定，因而生產出來的物資，不一定能够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第三，美國的經濟制度，在分配方面，也是漸趨公平。普通的人，不明瞭美國的經濟實況，以為在分配的過程中，資本家可以大權獨攬，為所欲為



這是這個錯誤的觀念。美國的工人，是有組織的。工人的工資，不是由資本家單獨的決定，而是由工人團體，以團體契約的方式，來與資本家洽商而定的。美國的公司，每年營業的賬目，是要公開的，假如年終的贏利太多，利潤超過了普通的水準，資本家是不能獨佔的，因為工會可以要求加增工資，將公司的贏利，分得一部份。我們可以舉出好些數字，證明在分配的過程中，工人有漸佔上風之勢。譬如在一九二九年，美國人民的勞務收入，為五百二十四億元，到了一九四四年，此項收入，增至一千零十七億元，幾乎加了一倍，而財產收入，在一九二九年，為一百五十三億，到了一九四四年，只有一百四十七億，不但沒有增加，而且還略有減少。工會的組織，是美國保證公平分配的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是政府的最低工資律及所得稅律。最低工資律，保證人民的生活水準，不致跌到貧窮線以下；所得稅律，可以防止富人，過一種奢侈的生活。這是美國的經濟制度，於維護經濟自由之外，還在企圖實現經濟平等的辦法。

第四，美國的經濟制度，使人民獲得世界上一個最高的生活程度。生活程度，是我們批評一個經濟制度的最好標準。假如一個國家，只會宣傳他的經濟制度，如何比別人的優越，但是在他們所謂的優越經濟制度之下，只能給人民過一種貧苦的生活，那麼不是宣傳有毛病，就是制度本身有毛病。美國工人生活程度之高，可以從好幾方面去說明。第一，我們可以把他每年的收入，與別個國家的工人來比較。譬如美國有最低工資律，別國也有最低工資律。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工人的最低工資，是否高于別國工人的最低工資。我們也可以比較各業中工人的平均工資，看美國工人的平均所得，是否超過別國的工人。無論那一國，假如他的貨幣，對於美金，有一個市場上公開的匯率，這種比較，是很容易舉行的。其次，我們還可以比較各國工資所能換得到的物質享受。譬如美國在一九四四年，製造業的工人，平均每星期的工資，為四十九元三角七分，當年麵包的價格，為二角一公斤。每一星期的工人所得可以換取二百四十六公斤的麵包。別個國家的工人，一星期的所得，可以換取多少麵包？再次，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生活程度，與他在食品上支出的百分數有關。凡是一個人的支出在食品上的百分數愈高的，其生活程度也愈低。美國都市工人，根據一九三四至三六年的統計，在食物上的支出，只佔總支出百分之三三點五，表示他們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還有很

第五，美國的經濟制度，應變的能力頗大。在平時，這個制度，可以集中力量于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戰時，可以改變方向，集中力量于作戰物資的增產。提高生活程度，是平時的工作，而生產作戰物資，乃是應變的工作。在平時，美國的生產機械，若不從事于作戰物資的生產。政府雖然也有兵工廠，但其生產的能力，只能滿足作戰需要的百分之十。可是一旦戰爭爆發，美國的工廠，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從消費物資的生產，改為作戰物資的生產。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此時應變能力的偉大，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這個經濟制度，用以提高生活程度，可以便人民的生活程度，達到最高峯；用以鞏固國防，可以使國家作戰的力量，為任何強國所不及。他不但可以作戰的物資，來配備自己的軍隊，而且還可以產生剩餘，經過租借的方式，租給同盟的國家。這種能文能武，能和平也能戰鬥的經濟制度，是極適應于二十世紀的國際環境的。

第六，美國的經濟制度，在國際方面，是採取合作方針的。他不孤立，對於別國的休戚，並不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他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已經有能力使自己繁榮之後，還有餘力來協助別國的繁榮。生產落後的國家，需要新式生產的設備，來加強他們的生產力量。這就需要，現在只有美國能够大量的供給。別的先進國家，或因大戰受到大損，或因國內生產的力量，只能用于復興本國的工作，對於生產落後的國家，都有愛莫能助之感。美國深信一國的繁榮，與世界的繁榮不可分，所以他的經濟政策，是要用他的龐大生產力量，來提高落後國家的生產水準。等到這些國家的經濟發達了，國際貿易的總量增加了，美國的國內經濟，可以因為這些刺激而更趨活躍。有人以為美國這種作風，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動機，我們不能否認大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沒有自私的因素，但是我們也得承認，美國這種政策，是利己而且利人的。如專為自己打算，美國的繁榮，並不像英法比荷等國，是可以建築在國內的市場之上的。在一九二九年，英國的進口貿易，等於全國收益百分之二十五，出口貿易，等於全國收益百分之十七。同年美國的進口貿易，只等於全國收益百分之五，出口貿易，只等於全國收益百分之六。由此再見國外市場，對於美國的繁榮，並不居於一個決定性的地位。他的貨物如不出口，對於本國的損失頗小，而對於那些需要復興建設的國家，則損失甚大。美國基于他本身的利害，同時也顧到別國的利害，所以在聯合國的機構中，他極力促成許多經濟合作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國際復興發展銀行，聯合國食糧暨農業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貿易

組織。這些機構的樹立，對於美國是有利的，對於別國也一樣的有利。這種合作，也許是世界大同的開始罷。凡是愛好和平的人，都是這樣期望着。

二 我厭惡美國的經濟制度

卓仁

討論美國經濟結構的優劣時，必須先規定一個時期，而且應當同時著眼於它對於當前世紀整個經濟形態的關係。美國現有的經濟結構是從它的歷史裡發展出來的，它的基本原則在早年已經定形，可以說是對於它拓殖時代的一種適應，所以如果以當年的情形來看，它的結構自有它的長處，問題是在美國現有的處境已經不似當年，適合於當年的經濟原則，在現在是否還能適合？所謂「適合」還得加以說明，適合可以有兩層意義，一是從人和資源的關係說，凡是能有效發展資源的可以說適合。二是從人和人的關係說，凡是能有效的促進人和人的合作的可以說適合。有了這兩個基本標準，我們才能去批評美國經濟中現行的原則的優劣了。

美國經濟結構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私人企業的自由競爭。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配上了美國這個資源豐富的新大陸，各個人可以憑藉自己的能力才幹去開發資源，自由競爭正是一個激發各個人努力的力量。美國的傳統信念是不要政府去干涉私人的企業。美國資源開發得這樣快，不能不有一部分歸功於這放任的經濟。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後期，企業家從合併和協議方式中，把自由競爭的原意消滅了，形成了獨占性的大企業。這時他們所謂「自由」和「放任」不是積極性的企業自由，而是消極性的排除政治的干涉，使獨占事業保持獨占的自由。獨占企業為了保持個別企業的贏利，控制了生產。譬如目前的鋼鐵業，因為企業家不願增加生產，以致其他生產事業同時受到限制，成了開發資源的「瓶口」。這是說，私人企業的自由競爭原則，在新處境中已喪失了它早年的作用，而成了阻礙資源開發的力量了。

在消費者的公民不通過政治去控制國家資源開發的計畫的美國經濟中，生產是決定於私人企業的贏利動機，資本累積，不斷的再生產，生產結果不能普遍的分散到消費者手裡，於是構成生產過剩，使不景氣成為不能有效避免的周期病。失業威脅下的勞工不能不以集體行動以求自保，於是在社會

的。

中分裂成勞資對立的形態，減少了社會的合作程度。罷工，怠工等一類經常的勞資衝突又加上了一種開發資源的阻力。

我們得承認美國已經部分的放棄了政治不干涉經濟的傳統，尤其是在經濟危機將臨，及已屆的時候，這個傳統的原則不能不退讓。但是我們並不能因為曾經退讓過而說美國經濟已經變質，因為祇要危機一日過去了，傳統原則又開始抬頭。如果美國能斷然把這原則放棄，我們也祇能說這是美國經濟的傳統原則失敗的證據。以目前來說，離開放棄這原則的時候還遠。我難則傾向於美國也會有一天接受社會主義的推想，但並不敢承認過去羅斯福時代的新政那一類的設施是永久性的修改。

現在的趨勢是美國為了要維持它國內的放任或「自由」原則，避免從這結構中常存的不景氣的威脅，企圖能造成一個美國貨物可以「自由」輸出的國際經濟，以致進一步要防止別國經濟的社會化。它一貫的反對各國簡單邊貿易，使國際市場保持其自由和開放的形式。這一種企圖牽涉到了它對國際政治的積極性，積極到不惜採取各種方式的干涉行為。

如果世界各國工業化的程度相等，資源分配得平均，多邊的國際貿易自然有它的長處，但是事實上，在這次戰後世界工業生產力的懸殊，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已經加深。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國際市場，將會引起更加不平等的經濟發展。美國的閃避美國的開放要求就是出於這種顧慮。在一個為了不同的原因，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的時代，美國還一方面又要壓迫其他各國停止或避免社會主義的計畫，結果不但不易安定世界經濟，而且會因之而引起政治的糾紛，而使世界經濟遭受打擊，甚至毀滅。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的局面來看，美國的固執是不幸的，也可以說，美國經濟所維持的原則對於今後世界是有害的，因為它可能促使整個人類的經濟破產。

三 答卓仁

慕眞

卓仁先生批評美國的自由經濟，以為美國的經濟制度，有好幾個缺點。第一，美國的經濟制度，不能充分利用資源。「譬如他目前的鋼鐵業，因為

企業家不願增加生產，以致其他生產事業同時受到限制。」這是一種主觀的判斷。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是否已會充分利用資源，要看人民是否充分

卅七，五月六日。

就來。美國現在就業的人數，在六千萬以上，誰都不能否認美國現在已經達到全民就業的境界。在這種情形之下，鋼鐵的產量，自然受需求的支配。假如人民對於鋼鐵的需要，果真超過鋼鐵業的供給，那麼鋼鐵價格必然上漲，鋼鐵廠有利可圖，自然會在別的質等中以高工資吸收勞力，因而鋼鐵是會增產的。美國的鋼鐵公司，每年產量在一百萬噸以上的，在第二次大戰以前，便有九家，沒有一家可以因為不願加增生產，而能使所有鋼鐵公司都減產的。

其次，美國的獨占資本，當為世人所詬病，但嚴格的講起來，美國除開製鋁公司以外，沒有一門實業，是在獨占的狀態下生產的。有些重要的實業，在獨占的競爭之下生產，則是事實。如屠宰、汽車、橡皮胎、農業機械等工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生產，為四個公司所控制。但是獨占並不一定是壞事。郵政是獨占的，我們並沒有看見人出來主張，要把郵政交給若干機關來經營。獨占每能使生產合理化，因而減低成本，因而減輕消費者的擔負。美國雖然有好些事業，處於類似獨占的狀況之下，但因政府管制有辦法，所以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指出，上面所舉的那些事業，其獲利之厚，是超過別種工業的。即以製鋁公司而言，在完全的獨占狀況之下，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間，鋁價下降了百分之十二，鋁的產量，從三十噸增至十萬三千四百噸。由此可見獨占並不一定高抬價格，更不一定減少生產。

第三，關於失業問題。美國在過去一百餘年之內，不景氣的確成爲不能有效避免的周期病。這樣的一個毛病，過去曾使許多名醫束手無策，好在這並非一個不治之症，像若干鄉下人發瘧疾一樣，寒熱來時，誠然痛苦，但不久也就霍然恢復。在奎寧丸沒有發明的時候，這個毛病是沒有法子醫的，但是在最近期內，歐美有好些國家，對於失業的病症，似乎已找到了奎寧丸。他們都知道，在失業的象徵出來的時候，由政府出來領導，增加社會上的投資與消費，便可使失業鬼跑開。美國在一九四六年通過的就業法，就是為醫治失業之症而預先籌備的奎寧丸。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假如

凱斯等對於就業理論的分析是對的，假如美國政府根據這個理論而產生的就業法案，可以無限廣泛的運用，則失業是可以防止的，正如瘧疾可以防止一樣。至於罷工怠工等手段，乃是自由的國家中，自由結合的勞工，用以提高其生活程度的一種手段。在獨裁的國家中，勞工是不許罷工或怠工的，但這並不足證明這些國家中，勞工對於生活程度已全滿意，而只證明人民的一種用以保護自己的自由，又遭剝奪了。

最後，我對於卓仁先生關於美國國際經濟政策的批評，認為是一種不健全的看法。國際貿易，互通有無，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程度的最好辦法。假如美國也學某種國家一樣，在經濟上求自給自足，不與別國自由往來，那麼受損失的不是美國，而是世界上別的國家。譬如美國在幾年以前，忽然退出聯合國善後救濟組織，試問全世界上的災民，靠誰來救濟？即以中國來說，我恐怕廣西湖南等省，便會發生大荒災，而有幾百萬人要餓死。又如美國忽然決定不把工業品運往外國，試問世界上那些農業國家，如想走上工業化的途徑，到什麼地方去購買機器？美國的經濟合作政策，不完全是爲自己打算的，確有利他的因素存在。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但他並不強迫別的國家，也要走上資本主義的路。他珍重自己的制度，但也能容忍別人的制度。他可以與走上社會主義的英國合作，也可以與想要走上三民主義的中國合作。他所不能合作的，乃是那些自以爲是而要強迫別的國家去跟他走的國家。假如別的國家，想以成績來與美國競爭，美國是不怕的；美國只怕那些派出第五縱隊，在暗中妨害他的別的國家。我深信任何國家，只要正式的經過多數人民的同意，應有自由推行任何經濟制度。美國的一套，也許不是最好的，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夾以成績來證明他的那一套，在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功能上，比美國的辦法更爲高明。假如有一天，別人的那一套，的確證明是比美國高明了，那麼，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我看沒有一個力量，可以阻止他去採用另外的那一套的。

四 答 慕 真

慕真先生列舉數字證明美國工人的生產能力比較任何其他國家爲高，美國生產機構的效率也比任何其他國家爲高。表面上看去自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造成這事實的有很多因素，經濟制度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我們如果要比較不同經濟制度的效率，就得先把其他因素除去。譬如說，一個資源豐富，得天獨厚的國家，不論它採取什麼經濟制度，它生產結果和生產效率必然

的超過一個地處荒漠的貧乏國家。美國在資源上，確是比其他國家強，所以我希望慕真先生能以資源相同的國家去相比，否則慕真先生所欣賞的將不是美國的經濟制度，而是美國豐富的資源了。談慕真先生所欣賞的經濟制度我想是人同此情的。講到資源和經濟制度的關係，我們要注意的是那一種經濟制度最能有效的加以開發。這裡就需要一點關於經濟制度性質的分析了。我們得發現每一

種經濟制度對於利用和開發資源的限度，譬如說我用奴隸生產的經濟制度，生產者的工作動機，他們消費水準等是阻礙利用和開發資源的因素。在資本主義這些因素改變了沒有？改變了多少程度？這種分析可以有助於我們的比較。

如果我們滿足於很多因素所造成的具體事實，不論這些事實，用多少正確的數字來表示，並不足以說明一個經濟制度在利用資源的能力強到什麼程度。慕真先生所提出他所羨慕，而且欣賞的美國經濟制度的性質，第一點是「自由」。他所特別注重的是選擇職業的自由，因為美國人可以「不受別人

的調度，不受他人的支配。」事實上是否如是？

職業自由還有兩層可說：一層是法律上的自由，另一層是事實上的自由。第一層還得從廣義說，一切利用公共權力來限制個人選擇職業的例子都得歸入沒有法律上自由的一類裡。在美國有沒有這種不自由的情形？我的回答是有，甚至可以說比中國多得多。美國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並沒有法律上選擇職業的自由。除非慕真先生和美國白人一般認為黑人不能算作百分之一百的美國人，我想這些人的不自由是應當記住的。憲法上雖則規定黑人有和白人所同的公民權利，但是各州的立法中却有歧視，更重要的是習慣法，黑人能選擇職業是有限得很。當然慕真先生可以說，黑人在他能選擇的職業有選擇的自由，在當苦力和當樂師之間可以有選擇的自由，如果這也算自由，除了囚犯和奴隸之外，沒有這種自由的人也太少了，因之也不值得人欣賞了。

另一方面是事實上有沒有選擇的機會。所謂自由必須有機會，你不喜欢某項職業就可以換一項職業。慕真先生也許可以從勞工流動率的數字上去證明美國工人轉職機會較多。（轉職容易是否指這個經濟制度高明是另一問題。）但是美國工人的轉職是否係表示挑選更喜歡的職業呢？還是一個廠裡把他開除了，又另外找一個廠去做工呢？美國工人對於失業的恐怖是很深的，他們會自動的放棄一個職業麼？這些問題我希望慕真先生去調查一下。我記得英國有一句格言「叫化是沒有選擇的。」一個失業的人是談不到職業自由的。

如果慕真先生單單欣賞美國工人沒有人強迫他們進入那個工廠去做工，（祇有被人強迫不許進入那個工廠，例如華工，和黑工）更可以欣賞無疑是我們自己的中國了。

慕真先生心底裡欣賞的「自由」還是在美國經濟中沒有「生產的計畫，並不受一個中央權力機構的指揮。」他認為由於價格機構來決定生產的經濟制度就表示這制度的最後決定者是消費者，所以是「最民主的」。這段話裡面牽涉的問題更多，我想決不是三言兩句可以討論得了。我想指出的是以價格來反應消費者的意志只存在於完全自由競爭的場合，而美國在今天離開這

場合的距離已經很遠了。慕真先生對於經濟集權深有反感。我並不批評他的反感，這是他的「自由」。我想問的是在企業龐大之後，每一重要的生產事業被少數獨占資本所壟斷之後，是否也同樣發生了寡頭的集權事實。在一個以政治權力來控制生產計畫的經濟體系，消費者還可以利用政治民主來參預及監督這計畫的集權中央；在一個寡頭企業家所壟斷下的經濟集權，消費者是否更難加以控制？所謂「民主」離不了「責任」觀念。一個不向消費者負責的獨占權力怎能說是民主呢？我希望慕真先生有機會能在這些問題再申說一下。

最後應該提出來討論的是美國經濟制度和世界政治及經濟的關係。也許在這一點上，我和慕真先生的看法距離最遠。說起來也和我們的切身問題更接近。我在正文中已發揮過我和慕真先生相反的看法。我在這裡所想指出的是，美國的經濟出口貿易固然祇占全國收益的百分之六，但是這百分之六的生產却是極重要的，因為如果這一項的生產無法輸出，可以引起失業，失業再引起國內市場的縮緊，因而成為不景氣的導火線。單在數字上看也許看不出它的嚴重性。因為如果美國想設法把這輸出工業改變為內銷工業還是可能的，但是要在一個孤島上去維持一個不致於受周期性經濟危機所打擊的經濟，他們必須加入若干和傳統自由經濟不相合的原則。換一句話說，他們不能維持現有的經濟制度了。

我並不是主張美國在經濟上退回去，不要管別個大陸上的事。慕真先生所提出來的國際合作原則是任何人所歡迎的。我所懷疑的是如果美國要維持它自己現有的經濟制度，它對外必須爭取一個國際自由市場，自由經濟制度不易在一個國家的界限裡孤立起來的。這個強項的經濟勢力衝入已經走上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世界，自難免發生衝突，慕真先生所說的「國際合作」，在事實上已經成了「國際壁壘」。

於是最後的問題也無法避免，在其他國家的立場說，接受美國的自由經濟容易發展他們的經濟呢？還是接受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容易？如果答案是屬於後者，為了美國着想，他們如果也改變他們的經濟制度，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對於他們有沒有損害呢？我希望慕真先生設想一下，如果以美國的資源，技術，和工業經驗，一旦接受社會主義，他們的生產率，他們的生活程度，他們的分配公平性，是否更能提高？慕真先生所怕的「集權」，是否能在美國政治民主方式中得到解決？權是總要集的，在社會生活日漸複雜中，人們不可以不加深接受社會的控制，問題是在所集的權是否向人民負責。我不像慕真先生一般欣賞抽象的自由，所以覺得祇要社會權力保持向人民負責的條件，集權並不是可怕的。

專論

當前中國的行憲問題

樓 邦 彥

當前中國的行憲問題，其關鍵並不在政府有沒有行憲的決心，而在今天的客觀環境是否適宜於行憲。

掌握政權者的決心，不足以確定那一政權的存在價值，因為決心祇是一種意志而已，正好像掌握政權者的善良動機與完美理想不能辯護那一政權的 existence 一樣，因為動機與理想最多也不過是一種意思的表示而已。決心，動機，理想……等意志或意思表示，不應是人民評估政權的最後標準；祇有決心，動機，理想等意志或意思表示的實施後果，才應是人民衡量政權的最好尺度。此所以我們對於目前政府的看法與態度，並不取決於它的行憲決心，頒布憲典與實施憲政對於我們的實際生活究竟有何裨益，政府的這樣做法是否等於自欺欺人的妄想。

在理論上說，行憲的目的無疑地是要把一國的政權建築在民意的基礎之上，但是我們的政府儘管頒布憲典並宣告行憲，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還是民意不斷在被壟斷，以及太平可以在短期間被粉飾起來。政府顯然是爲了要鞏固其岌岌可危的政權，乃不能不在表面上迎合潮流，不能不顧到當前的事實。

去歎贊好於某些外國，這是今日行憲局面之由來。在人民的那方面，他們一直在遭遇着自由與生存直接間接的被剝奪，此種危運與不幸是武力黨爭的必然結果，祇要武力黨爭依舊繼續，行憲非但沒有予他們以任何刺激，因行憲所附帶產生的各種罪惡反而增加了他們的煩惱。不說別的，各地各階層的人民那樣淡然漠視南京的那種熱烘烘的場面，當然絕非偶然之事，而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憲典與憲政是不同的兩回事情，這是最普通不過的政治常識，但是一向

爲不少人所忽視。憲典是一個國家的某一種具體的法律文書，用來規定其基本國家組織的。大體上說，它的制定與修正程序異於其他法規，它的法律效力也高於其他法規。去年元旦國民政府明令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是目前中國的憲典。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一定具有各種關於基本國家組織的法則，憲典往往是這些法則中的一種，憲法 (constitutional law) 是這些法則的總稱，但憲典並非構成一國憲法的必要因素，英國法制即爲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憲政 (constitutionalism 或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是基本國家組織動態的某一種形式的表現，它有兩個基本假定，一是「民主」的假定，假定人民爲國家政治的主體，一是「法治」的假定，假定政府權力爲一種有限制的權力。基於此種認識，我們可以歸納而得憲典與憲政關係的四種不同典型：

- (一) 有憲典而實施憲政，
- (二) 有憲典而不實施憲政，
- (三) 無憲典而實施憲政，
- (四) 無憲典而不實施憲政。

美國可以代表第一個典型，因爲它既有一部憲典，同時在某一個程度上，憲政的確可以說是粗具規模。戰前的日本可以代表第二個典型，因爲它雖有憲典，但它的那種超剝奪的天皇地位與軍人干政的現象，却致使它拋棄了憲政的目標。英國可以代表第三個典型，並且說不定是唯一的一個例子，因爲它雖一向沒有憲典，但從各方面觀察，却是一個標準的實施憲政的國家。戰前的德國可以代表第四個典型，自從希特勒建立獨裁的政權以後，他一方面撕毀了威瑪憲典，另一方面又拔除了憲政的基礎。

以上是說明了憲典與憲政兩者是並不發生必然的關係的：憲典的頒布不一定當然地促成憲政的實施，同樣的，憲政的實施也不一定非頒布憲典不可。固然今日無憲典而實施憲政的國家，除英國以外尚無其他例子，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過分重視憲典的形式，因為憲典的功用究竟是有其限度的。要實施憲政，在頒布憲典以外，尚須其他更實際的努力。不幸的，我們的政府却偏以頒布憲典的形式來作民主的標榜，事實上，一紙憲典不但不能救治，且又遮蓋不了，遍地的罪惡。不久以前，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發表了一篇以「中國在轉變中」為題的社論，讀了實令人十二分失望。那篇社論的主旨是在說明中國第一部民主憲典業已頒布施行，因為這是首次在基本法內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原則，中國正在進行着把封建的專制典型轉變為近代的民主典型的艱難步驟，使得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民主憲政可以逐步建立起來。除非這是一種政治性的為中國粉飾太平的論調，要不然，不是沒有弄清楚我們的三四十年的制憲史，就是錯誤地把頒布憲典實施憲政混為一談。從中國幾十年的制憲史上看，以基本法來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原則，這並非初次。我們大家所期待的不是含有民主條款的憲典本身，乃是過於白紙上黑字的憲典的表現某種基本國家組織動態的憲政。直至今天，在我們的制憲史上雖又增添了簇新的一頁，但是像過去的經驗一樣，我們多半還是期望不到絲毫憲政的迹象。我們一方面固不以美國人的無聊捧場為然，同時却更堅定地相信政府的假藉頒布憲典而別有用心的企圖。這企圖至究竟仍是妄想，而幻滅是妄想的必然結果。我們相信大多數人的政治意識是清醒的，他們從未把舉行大選，召開國大……等熱鬧玩藝看作嚴謹的正經事。看得遠些，這未嘗不是顯示了國家前途的一線生機，看得近些，這正是政府所以破壞的根本原因。

抑又有進者，政府的造成今天的行憲局面恐怕有另一種企圖，那就是想沖淡當前混亂狀態的嚴重性。當前的混亂狀態，原因既複雜，性質亦微妙。觀乎目前的軍事形勢，及其所產生的經濟與社會的後果，人人都在受着不同性質的壓迫，行憲又如何能沖淡得了混亂狀態的嚴重性呢？我在另一處曾經說過，行憲的一齣戲檯又演出了，政府所感到的苦惱仍將與日俱增，並且苦惱者「依舊是今天這班達官要員，祇是換上了新的外套，增加了些陪襯嘆

而已」。（見我的「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一文，載「觀察」四卷五期）在理論上講，一面有混亂狀態的存在，一面還要開始實施憲政，確實是一種徒然而落空的努力。徒然的，因為既有混亂狀態的存在，即使退一步假定政府確有實施憲政的決心，其結果是必無成就；落空的，因為即使把一切實際的憲政場面都安排好了，混亂狀態的演變仍舊可能是不堪設想。

政府的焦急，亦極顯然。自從去年元旦公佈了新「憲法」以後，即着手組織國民青三黨的聯合政府，跟着又頒行了「研員戡亂成憲政實施綱要」，其目的在「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行憲政」。就這個「綱要」的精神說，政府必須藉「厲行全國總動員」為手段，來「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庶幾憲政得能如期實行；否則，在邏輯上，共匪叛亂一天不能戡平，民主障礙就一天沒有掃除，憲政也就無以如期實行。但倘使不「如期實行憲政」的話，既有失政府的威信，且又影響所有業已安排好了的場面，於是行憲的國民大會終於在三月二十九日召開了。同時，一個很實際的問題跟着又發生了，假若在表面上不得不遵守新「憲法」的規定，則總統的權力自不免要受相當的牽制，而假若用修憲的方法來加強總統的權力，則又有多方面顧忌，結果是採取了一個變通的辦法，通過了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與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不受新「憲法」任何約束的緊急處分權。這無異是在施行「憲法」之始，即行宣告暫不適用新「憲法」的規定，此豈非一手頒布了它與，另一手馬上又把它撕毀了麼？王世杰說得很率直，通過臨時條款「並不表示對未來總統絕對信任，事實上是因為如果沒有這條款，沒有人能够戡亂」（見四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換言之，如果不通過這樣一個把新「憲法」改頭換面的臨時條款，原來的新「憲法」是絕對有礙於動員戡亂的，這對於各我們說明了一面倒地一面行憲的矛盾。政府原是想以行憲來沖淡當前混亂狀態的嚴重性的，今臨時條款既經通過，這嚴重的狀態就取得了「合法」的根據與「民意」的支持。

總之，無論是妄想以頒布一部冠冕堂皇的憲典權充憲政的實施，或是企圖以了憲轉移人民的目標，兩者是都十足顯示出政府的悲哀，遺悲哀又替人引來了苦惱與失望。

準備金多了有什麼用？

劉大中

財政部長俞鴻鈞氏四月十四日向國民代表大會報告目前我國財政狀況，關於金融貨幣方面，曾作下列敘述：

「……截至上月底止，法幣發行數額總共尚不及七十萬億元，政府除保有外匯、黃金、白銀共值約美金二億九千萬元外，最近已擬有出售國營事業資產充實法幣準備辦法，……總計價值四億美元，……作為法幣準備金之一部分，……深信從此法幣得有最穩固之基金以充準備之後，其價值必自相當穩定，物價亦可藉以平抑」。

這種荒謬的說法，從一個經濟學人的立場來看，簡直不值一駁。不過這是政府實際負財政責任的人所提出來的正式報告。政府並且還要利用這種增加準備金的辦法去穩定幣值，妄想「物價亦可藉以平抑」。這樣一來，民生將因之而受很大的影響。我們不能不費一點筆墨，加以嚴正的駁斥。

幣值是否穩定，只有一個簡單到萬分的測驗方法。假如在這個星期一的時候，一萬塊錢可以買四兩麵（或是某數量的其他物品）。到了下星期一，如果一萬塊錢仍然可以買四兩麵，幣值在這個星期內就算穩定；若是只能買二兩麵了，幣值就跌落了一半。在這個星期內，政府所存的準備金，也許增加了一倍，甚或是一萬倍。但是這與人民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干——一萬塊錢仍只能買二兩麵，幣值還是跌落了一半。在我們現行的貨幣制度之下，準備金的增加或減少，與幣值的高低以及人民對於法幣的信任心，並不能發生直接關係。最近國民大會通過的「重慶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更保險使準備金和幣值在戰事推進期內絕對不發生關係（「總統在重慶戡亂時期，為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之通過，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所規定之程序限制」）。這也許就是這個「臨時條款」的妙用之一。

黃澄澄的準備金（財政當局所發表的準備金數量，除本來就是黃澄澄的一部份外，其餘的也是用一種黃澄澄的單位去計算的，這種單位也就是政府三令五申不許人民用作貿易計算單位的），確會有過其「黃金時代」。在大學二年級所念的貨幣銀行學中，我們不是都讀過準備金的重要嗎？可惜的是，時代已經變了。金本位以及變象的金本位的「黃金時代」，早已是歷史上的

陳跡了。不但早已過去了，並且甚至於是翻過來了。在現況之下，可能是準備金減低，幣值反而可以得到暫時的穩定（政府若把所有的美金準備金，全換了糧食進口，人民多少還可以佔一點光）。

在金本位盛行的時候，準備金對於幣值的確有些控制的力量。理由不外下列數種：

(一) 人民對於紙幣若是不信任的時候，他可以請求兌現（請領黃金）。政府的準備金若是足的話，兌現可以辦得到。人民在拿到一些黃金以後，信任心往往已可恢復。要求兌現的因之由多而少，由少而無，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二) 有的時候，紙幣發行的太多了。同時，物資的供給不能同等增加，甚或減少。政府就算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把所有的紙幣都兌了現，每兩黃金在國內所能買到的物資還是那樣少，幣值仍是不能提高。政府甚或有百分之三、四百的準備金（我們的政府就會這樣自家的說），能夠把全數紙幣兌現而有餘。政府若真是一高興把所有的準備金都發出來給人民，而人民可能購到的物資總數還是那樣少，每兩黃金所能購到的物資反而要因黃金流通總數增多而更減少，幣值不但不能提高，反而要因之而再減低。但是在金本位制度下，這種情形是不會有的。人民兌現得來的黃金，是可以自由運到國外去買物資的。人民因為有兌現和運金國外購買物資的自由，所以國內的通貨會因運金國外而減少（假如政府不陸續再狂發鈔票的話），物資却可因進口而增多，物價自會減低，幣值也自然就會提高。人民對於貨幣的信任心也就可以恢復了。

(三) 當幣值開始猛烈跌落，人心將要動搖而可能開始要求兌現的時候，政府若真是在誠實的、負責的執行金本位，就會照例收縮通貨和信用，自動矯正這種不正常的狀態。事實上，當幣值跌落的時候，國際收支必會逆轉，黃金必會出口（或是損失外匯），政府為保持法定的通貨與黃金（或外匯）數量的比例，也只能收縮通貨和信用，幣值自然也就可趨於穩定。

我們並不是在這裡贊成金本位。更不是在這裡主張政府應在此時採用金

本位。事實上，我們現在不但不能（並且不應）採用金本位，就是銀本位也不應採用（我們的政府却可能正在考慮採用類似銀本位的制度）。我們只是說，在不折不扣的金本位制度下，或是在稍有折扣而仍不失要義的變象金本位制度下，因為有上述三項理由，準備金確是幣值的一重保障。

但是我們的政府能作到上面所開的三個條件嗎（兌現、自由運金國外、自動收結通貨和信用）？在現在的情況下，不但我們說政府作不到，政府自己也沒有說能作得到。從經驗中我們知道，政府說能作到的事，不一定能作到；沒有說能作到的事，怕是絕對的作不到了。既然作不到，準備全多了有什麼用？

這一點簡單的道理，我們的政府可能也懂得。財政當局的樂觀報告，只能只是為安慰這些熱心捧場的國大代表。但是人民有權利要求政府說實話，要求政府切實保障大多數人民的購買力。

人人知道，幣值的跌落是因為物資的減少，和通貨數量與流轉速率的增加。政府要推行「國策」，所以物資只可一天天的減少。政府又說通貨數量增加的不算多，只有區區的五萬倍（從民二十六年的十四億到現在的不到七十萬億）！但是我們能不能把這些「區區」之數用財產稅和高度累進所得稅收一些回來？流轉速率的加快，是通貨數量「區區」增加的直接後果。「無隔宿之糧」的人民，拚着血汗掙得一些鈔票之後，他們有權立刻把鈔票花掉，

從「牛郎織女」看中國社會

全懇天

我小時常聽祖母講牛郎織女的故事。夏天的黃昏，祖母陪着我在屋前曬穀場上納涼，一面用櫻圓扇為我打蚊子，一面說故事給我聽。牛郎織女的故事即是常說到的一個。她有時甚至指示我：那是天河？牛郎星在那裏？織女星又在那裏？我那時對這故事已分外感覺興趣。由於非常相信這故事的真實性，每到七月七日晚上，常想等到夜闌人盡，看牛郎織女是否真的相會？怎麼走鵝橋渡河去相會？可是不久我就入睡，空留得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的懊悔。這是我幼年最美的一段回憶。我想生活與自然發生極密切關係的中國鄉村中人，或在鄉村中生長的城裏人，總不會沒有這同樣經驗的。

他們沒有第二個方法保障自己。政府若覺得他們的「心理」不健全，那麼全國絕對大多數的人民（全是「無隔宿之糧」的）事實上只有在不健全的心理下才能有一日之糧！另外許多有「億萬年之糧」的人，却在利用銀行機構加快通貨的流通（去年十月份上海商業行莊存款流通的速度是每月四十七次，現在又有增加），政府却並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去制止。在這種情形下，對於徵收財產稅和高度累進所得稅，政府沒有誠意去辦。對於限制奸商利用銀行機構去作囤積和投機生意，政府全不出有效的方法去辦。對於在現況下毫無用處的準備金，却大吹大擂的去作紙面上的增加。難怪人民對於法幣的信心無法提高！

我們對於這種增加準備金以圖鞏固幣值的辦法，也並不是全無贊許之意。為穩定幣值，政府已經想到變資國有資產這最後的一着了。在這些資產中，有的是頗能替政府賺一些錢的。在過去一兩年中，政府曾賣着中紡公司的收入而少發行了不少鈔票。政府越賣這些資產，以後的收入越少，就越有再賣資產的必要。賣來資去總有賣光的一天。到那時候，政府也許真要徵用豪門資本了。所以天下有百弊的事，可能也有一利。但是我們也不可太樂觀。誰能保證這些國有資產不先賣到豪門的手中去呢？

這故事，或者說它是神話，不單普遍流行於現代的中國鄉村中，歷代民間均有它的存在。它的足跡佈滿了過去和現在的中國社會。遠在周代，詩經小雅的大東一章中，即有「維天有漢，盈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一段。可見全部故事即從此時有了端倪。後來古詩十九首的迢迢牽牛星，曹子建的九詠，謝惠連的七月七日夜詠牛女，雖然都只是一種詩人的詠歎，但至少顯示了這故事在當時社會中存在的事實。風俗記與荊楚歲時記二書描述得比較確切：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鵠爲橋。相傳七日鵠首無故皆髡，因爲梁以渡。」
「織女故也」（風俗記）。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

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度相會」（荊楚歲時記）。

這與現代民間所傳說的牛郎織女的故事，大致是相彷彿的。祖母當年所告訴我的，好像是如此。

一個社會所流行的故事或神話，必然反映出這一社會的現實。近代許多人類學家關於初民社會的研究，即證明了這一句話的真確性。反過來說，一個社會的現實，也可以從它流行的故事或神話看出來。然則牛郎織女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什麼呢？我們從這故事中所看到的中國社會的現實是怎樣的呢？下文即想對這問題略加討論。

一

德國社會學家 Müller-Lyer 認爲在人類社會演化過程中，最初有男女間的分工，漸次有男子間的分工，工業革命後，女子間的分工也出現了。一般說，中國社會中尚只有男女間的分工。大概男子耕種田地；女子紡織而外，兼治燒飯、洗衣、餵豬、養雞等工作。所謂「男治外，女治內」的原則，大半導源於這種兩性間分工的基本事實。社會中的男子固然也有士、農、工、

商等職業之分化，但士、工、商三種人究竟是少數。在全人口中，農民約占百分之七十五，甚至百分之八十。如果我們遇見一個陌生的鄉下老百姓，不經介紹，即認定他是農人，大致是不會錯認到那裏去的。並且在比較少數的士、工、商三種人中，除了極少數士人真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之外，其餘如木匠、瓦匠、裁縫以及一般小本商人，也大多是兼營農業的。他們在農閒時固然各操一門特殊技藝，賴以營生，但農忙時則幫同插秧或割谷。這種情形在中國內地各省的農村中尤為普遍。一般人認定中國是農業國家，中國社會是農業社會，並不是偶然的。至於女子，焦仲卿妻未嫁之先，就得

個農家門前禾場邊的矮樁上繫着一頭肥大的牛。他們愛牛甚至勝過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不妨說，中國男子大半是農夫，這些農夫全部是「牛郎」。他們的妻子，則因農地過小，每年收穫不能維持一家人食用，爲了在經濟上減輕丈夫的重擔，故全家需用的衣服，大半由她們親手紡織。如此一則可以補足家用，一則可以避免商人從中剝削。紡織原是機器工業不發達時代的中國農家主要副業之一，操持這副業的主要責任就在每個女子的肩上。現代鄉下的每一個農家也許不一定都有織布機，但紗車却是必備的，有的人家甚至還不止一架。現代農村中的紗車至少和耕牛同樣普遍。中國男子既是「牛郎」，中國婦女難道不是「織女」麼？所不同的是，神化了的織女星除紡織而外，似乎沒聽說還要兼治洗衣、燒飯、餵豬、養雞等工作而已。

如上述，牛郎和織女原是存在於人間，具體的說，中國現實社會中，而且牛郎和織女的數目是很多的。而中國人偏要把他們引渡上天，由很多對牛郎織女化為一對牛郎織女，由黃河長江流域遷居銀河兩岸，這是否出諸人性的幽默呢？

二

人類基本生活除吃飯穿衣之外，還需要性的滿足。異性間的感情生活，似乎僅次於衣食的重要性。牛郎耕種，織女紡織，衣食兩方面的生活總算有了交代。留下的便是牛郎和織女間感情如何調協的問題。

中國人對付這問題的方法的原則就是一個「節」字。怎樣「節」呢？則是詩經所謂「發乎情，止乎禮」；荀子所謂「男女之合，夫婦之分」。一面允許夫婦「發乎情」，有「男女之合」；一面更重視「止乎禮」有「夫婦之分」。

上述原則也反映於牛郎織女故事中。荊楚歲時記說：「嫁後遂廢織」。新婚的牛郎織女嬉嬉哈哈的調情，甚而至於牛郎因此而廢耕，織女因此而「斷一匹，四日五丈餘」。木蘭代父從軍前也會「當戶織」，等到爹娘不聞「唧唧復唧唧」的「織杼聲」，才發覺女兒有了心事。凡是生長在中國鄉間的舊式女子，那一個不善於紡織呢？在她們之間，更找不到絲毫職業分化的跡象。

一般男子除了靠自己勞力耕種而外，其所利用的獸力就是牛。耕田要牛，拉磨也要牛，牛是他們生活的主要生產力。我們在農村所常見的，就是每

「脉不得語」，但各自從事其正當的職業。這就是「止乎禮」，「夫婦之分」。從此牛郎織女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三百六十四天是「夫婦之分」，只有「七月七日」一天是「男女之合」。「天帝」視「夫婦之分」重於「男女之合」的意旨，很明顯的見於這死板板的規定中。無疑的，這故事不但是反映了中國社會中夫婦相處之道，回頭又變成了中國社會中夫婦相處之道的一個準則。所謂「天帝」的意旨原即是社會的意旨。

中國老百姓對於「上床夫妻下床客」與「相敬如賓」的道理莫不體味得非常深刻。他們看不慣男女掛着手臂在路上行走，夫婦在人前談笑也認為有些害羞。他們雖不反對夫婦之間的感情「如魚得水」，但總須有一個，而且比較遠的，距離。夫婦對待的態度不是「親」，而是「敬」，而且要「敬如賓」。湖南老百姓普通稱妻子為「堂客」，把堂中之客與主人正當相處的態度搬到夫婦的關係上來，由此可見一斑。他們是如此看法，也是如此行為。

鄉下夫婦在一起很少話說，甚至很少在一起。男的沒事，就喝茶抽煙，在茶館中領受忙裏的閒暇。女的在村子裏也有她要好的張大嫂，李大媽，常偷閒坐在一起說長道短，很有趣味似的。他們的感情生活並不一定在夫婦之間求得滿足。至於一般士、工、商等三種人，或因求名，或因謀利而外出時，通常把自己妻子留在家裏侍奉父母的。每隔相當期間歸省一次，夫婦才得見面；這尤其類似牛郎織女「七月七日」的相會。中國社會中一般夫婦的關係，正切合牛郎織女間的關係；至少二者在精神上是非常一致的。

但這種節制夫婦感情的法則却並不妨害夫婦間正當情誼的建立。「久別當新婚」，惟其有「夫婦之分」，才能「有男女之合」。牛郎織女雖然只一年會面一次，但這一面的歡樂勝似人間三百六十五面的歡樂。我們能說這種平日淡然相處的中國夫婦之間完全沒有感情麼？不；至少不易見到他們因感情破裂而離婚的事實。有人說：中國文化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家庭的主要基礎繫於夫婦正常關係。如果夫婦間沒有適當的情誼，則勢必常發生離婚的悲劇，則勢必造成家庭的解組，則勢必動搖以家族為本位的中國文化。這一連貫事實的出現，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事不出此，中國家族始終是一個堅強的組織，中國文化也居然綿延到而今。這並非偶然。原因在那裏？牛郎織女的故事似乎給予了一個重要的啓示。

目前中國社會正在加速度演變過程中。演變帶來了混亂。明天的中國社會是什麼樣子？沒有人能够預言。但其不同於過去與現在的中國社會，却是必然的。一個社會所普遍流行的故事或神話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將來中國社會改觀了，現有的牛郎織女故事也可能在民間消滅。再過一百年後，中國鄉下小孩子是否還會聽到他們的祖母講牛郎織女的故事呢？我很懷疑。

女間的分工，男子耕種，女子紡織；（二）重視夫婦隔離之道，男女有合，尤應有夫婦之分。孟子曰：「食色，性也」，任何一個社會也都有「食、色」兩方面的現實。我們根據前一特徵了解中國社會「食」一方面的現實，後一特徵了解中國社會「色」一方面的現實，大致是不會錯誤到那裏去的。

這兩個特徵同時存在於中國社會中也並不是偶然的。中國人民普遍具有生產能力，生產能力很少運用。換言之，他們只賴自己人力或獸力而工作，

通訊

民 在 清 華 園

——清華園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假如說數十年來中國有些見進步的話，清華園該是這進步的一個苗頭。在它的保姆手中撫育的傳統最熟識，最寬大。它吸收西洋文明的進步因素，最快，也最便利。同時，數十年，尤其是「一二·一」以來的學生運動中給予它充份民主的實習。它幾乎像一座溫房，讓民主的幼苗在這冰冷凶殺的世界土，慢慢地滋長。從四五到今天，這一顆民主幼苗，由弱小到茁壯，敢說它是向着希望，推動着苦難中國的新生。

總我要用許多瑣碎的事實來說明清華園內的民主。這些事實不完全依照着發生的時序，然而唯有這些事實才配做民主生活的證人。

（一）觀其制度，必先觀其人

清華園的師生差不多都是熱愛民主的。教授們：不知用「民主」敘過多少次文章的題目，演講過多少遍「民主」的思想。例如「教授治校」的制度，就奠定了民主的楷模；不但學校的校務因之蒙受「民主」的益處，學生們也因之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正不知中國今日有多少學校的民主風氣就是被那些頑固，偏執的爲人師者所摧殘了呢？而清華園幸有開明師長的愛護，乃能使「民主」在這兒成爲一個道德的綱目。但欲觀其制度，必先觀其人。現在先說明「清華人」民主生活，或可幫助瞭解園境的民主。

這裏的人是忍不住現實的苦悶。他們要唱，要舞，要把對於現實的憤怒發洩出來，請聽這一支最流行的茶館小調。

『晚風吹來天氣凜冽！東街的茶館真熱鬧，樓上樓下客滿座啊，茶房開水叫聲高。杯子碗兒丁丁噹噹，丁丁噹噹響呀！瓜子殼兒剥剥叭啦，劈叭啦滿地拋，有的談天有的吵，有的苦惱有的笑。有的談國事來，有的就發牢騷。只有那茶館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來細聲細語說得妙，細語說得妙，諸位先生生意承關照，國事的意見千萬少發表，談起了國事容易發牢騷啊。引起了麻煩，你我都遭殃，說不定一個命令，你差事就撤掉，我這小小的茶館貼上大封條。撤掉了你的差事不要緊嘛，還要請你坐監牢。最好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哈哈，喝完了茶回家去睡一個悶頭覺，去睡一個悶頭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滿座大笑，老闆說話太蹊蹺，悶頭覺，睡够了，愈睡愈糊塗呀，愈睡愈苦惱，倒不如乾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說清楚，把那些鬱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剷掉。』

這不是一支反抗言論不自由的申訴嗎？唱這樣歌的

人是多麼迫切的期待整個社會走向民主哪！

他們的詩，是爲人民的，用民間生活做詩的內容，《鄉俚野語》做詩的詞句。畫要畫人間的苦難相，刻也要刻人民的痛苦痕。也只有這樣對人民的熱愛，才構成民主堅實的基礎。

（二）一千人有一千張嘴巴

輿論（主要是壁報和民主牆）更值得注意。清華的壁報種類很多，經常出版的至少有四五十個，壁報的編者有的是專門爲出版壁報的社團，有的是系級或有其他工作的社團。前者主要工作是評論國內外的時事，或批評公開批評的大量，清華園才可以舉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論會」，才可以把世界的思想紛紛拿到清華園來討論。

書館是讀書的好地方，一個是學校設立的，藏書之富，在此不必介紹。另外一個「一二·一圖書館」，爲紀念周多先生而建立的，在這裏，有着「非禁書」的自由，也有着「禁書」的自由，清華園的民主就表現在這種充分的自由上。同學們也各各相信：「非禁書」的毒素遠不掉他們的觀察，「禁書」的「毒藥」也害不了他們。這種獨立的判斷並不包含剛愎武斷的性格。所以每當任何事件發生的時候，同學總要先去訪問先生。師長們的意見常是被同學考慮接受的。因此教授的指責免除了許多同學的錯誤。同時，在清華學生也可以很坦白地訴說他們對於師長的意見，例如一篇批評費孝通先生的文章，和費先生自己的文章，同時在一本清華旬刊發表。這豈不是清華民主堡壘最可以驕傲的事實嗎？唯其有這樣公開批評的大量，清華園才可以舉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論會」，才可以把世界的思想紛紛拿到清華園來討論。

壁報是清華的觸角，它最敏感，常常供給許多可貴參考的事實，每當一個新的事件來臨的時候，壁報就是群衆的號角。總是首先把問題提出來，用大字標貼在民主牆上。他們所擾的問題，常常是大家共同的問題。因此，民主牆上馬上五色繡粉。平時，民主牆上貼滿了的討論會，研究會，研究各人有興趣的問題。有兩個圖

事件發生後，馬上出現的是長篇大論、小字文章；就發表者而言，用私人學號者有之，用系級學會者有之，用社團名義者亦有之，每個同學只要想說，就可以自由的說。縱談天下大事，可以；吹毛求疵也可以。言辭雖然可以，態度溫和也可以。無論觀點偏左或是偏右，只要不干犯別人，都可以自由說。說由說者說，看由看者看。無論大事小事，評論者決不放過。小事如系級是否可以直接向電影小組購票爭論，大事像于十三事件是否應該流行也要爭論。輿論的紛亂，正足以造成行動的一致。因此，同學們是不肯放棄發表意見的機會的，人有一千張嘴巴。清華園大事方息，小事又起。民主牆上張貼的紙積厚一寸，並不足奇。這就是清華園民主的教室，氣氛的晴雨表啊！

輿論並非空論，每次輿論成熟的時候，也就是大家行動的開始。當民主論議趨於一致的時候，自治會代表會的決議，也常不離乎民主議事會的主張。例如最近代表會決議支援教職員罷工之後，同學們便紛紛動員起來，贊助工友的工作。地質系同學來掃地，航空系同學管理鍋爐，電機系來管理電話，機械系來管水電，外文系來翻譯宣傳文件，中文哲史等系擔任起草編輯，化工系管理畜牧場，社會系要打掃廁所。只有這樣通力合作，來支持大家的決策才算是真民主！最有趣的是「午敘會」，全體同學都來開會，工友和先生也來參加。主席團擬定了討論的議程，讓全體同學按系級單位分別討論。每一個問題給與相當時間，例如討論「反飢餓反迫害運動，我們得到什麼教訓？」各系同學就把各人的意見說出來，記錄下來，修正一遍，送給主席團，作最後的綜合。討論之後，每一個單位還有一次向全體同學宣佈他們討論結果的機會，作一次系級意見的比賽，這樣供給主席團一個良好的決策根據。

工作結束的時候，往往開一次同樣形式的檢討會，由這樣廣泛熱烈的討論中，才能知道同學們對於各部門工作的批評。大家都毫不客氣的指責和獎勵。根據這樣的工作所得到的決定，是完全民主的。

(三) 制度與競選

民主不僅是一種表現在生活上的精神，同時也是一個表現在組織上的制度。清華的自治會，由立法與執行兩機關組成，同時，向全體同學負責。全體同學的全體會員大會，雖是最最高權力機關，但在沒有重大事情的時候不開會，把權力交給代表會。代表會由各系級分別選出，每二十人選出一人，一年級新生在第一學期沒有被選舉權。代表會負責代表同學的監督理事會，審查理事會工作計劃，預算和檢討其工作的缺點。理事會則由全體同學總投票，決定人選，誰能得大多數同學擁護，誰就是同學公僕，因此競選理事是清華最緊張的一幕。

所以我必須把自治會選舉的方式多寫幾句。這是民主學習的主要工作。沒有健全的選舉不會選出健全的理事會，沒有健全的理事會，不會產生健全的理事會。這些地方也正在大辦選舉，但是他們的方式與清華的選舉頗有不同。我想，假如他們看了這一篇文章，是不是也想像清華學習一次呢？

選舉委員會宣佈選舉日程以後，民主牆上一寸的面積都變成寶貴的了。最先貼出來的是毫無介紹的名字，是為光給選民一個印象。最初張貼的名字，一個比一個寫得大，一個比一個貼得高，越來越醒目。接着出頭了一各種的「特刊」，介紹候選人的履歷，一個候選人有十幾項名銜並不稀奇，有的介紹候選人考試的成績，有的集體介紹其工作能力，有的畫大幅肖像，張掛各處，有的用旗子，布條到處宣傳。甚至有編競選歌，以收普及之效。不要忙，接着五十人競選報名推薦和海報貼出來了；緊跟着一百人，二百人聯名推薦也貼出來了。

競選最熱烈的那幾天，整個清華園，到處貼着毛筆寫的、油印的、木刻的標語和肖像。

吃飯的時候，飯廳裡走來一隊競選團；打着旗子，唱着競選歌，一個人站起來介紹候選人本領和功績，博得許多同學的掌聲。有的人就利用擴音器向飯廳廣播。最引同學注意的，還是競選演說。例如這次就有一位同學的清華園華萊士號召競選。選民能够不由宣傳，廣告中認識候選人，而是親耳聽見候選人的政治理想和政綱。

最後有一個競選晚會，晚會上有各種的音樂，對聯的代表致賀辭，接着是競選演說。一位化四的女同學說：「因為我是大五，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千萬讓我有一個最後的機會來為大家服務。」同時她接着說：「我願意盡力加強清華園內男女同學的感情聯繫，但必須對男同學特別說明一點，這並不是替你們介紹女朋友的意思，這是要靠你們自己去競選的。」說完滿堂哄笑。

接着「民間歌舞社」表演「狀元及第」。又有××

×競選團的工作報告，報告競選經費的來源。

我們在這裏所願意強調的，就是清華競選理事的不是議議的，更不是虛偽的，他們的口號是：「從同學中來，回到同學裡去。」

我們不惜用大部份篇幅來敘述清華園的選舉，是值得的。唯有讓選民切切質質看清楚選人的政綱和主張，聽到各方面的介紹和批評，才能「選賢與能」，像這樣選出來的人決不是，也決不能，被某種心法所操縱的。

最近理事會選舉揭曉以後，清華園投票的人數只佔百分之八十弱。二千多同學中，不熱心大家事情的，還有一百零三十二人。

新理事會走馬上任以後，他們第一件事就是徵求同學對於過去理事會各部門工作的意見和批評。接上就發表工作計劃，工作原則，提交代表會審查。經過全體代表細心的審查，做了一些較微的修正後，就通過了。新理事會上任不久，他們的競選時預期的支票已經有不少兌現了。

(四) 是現實的諷刺嗎

按我們題目的意思，是想敘述民主精神在清華園穿著怎麼樣的外衣，本無意誇耀這外衣多麼美麗或是多麼進步。但無可否認的，這種民主生活是值得學習的，至少社會上不必對它作一些不必要的誤會，這種誤會常常發生於一般沒有機會又沒能力去嘗試這種生活的人。在這樣的時代，但願清華園的民主不是奇談，不是一個現實的諷刺。讀者更不必當它是個幻境，從這條路走上去的人，必將靠近一個新的社會的。

鄂南農村

武昌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一個社會的結構，或是到了變動的時候，或是給一般冒險家一個容易發財的機會，而同時，也是一般平民，大家到了無法生活的時候。湖北東部的一個縣份，距離省會（武昌）直距離還不到一百公里，而其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更把這個對照顯得十分分明。

「現洋」與「放谷帳」

這個曾經輪陷七年的小縣份，在敵偽時期，農民的生活，本已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及至勝利以後，人們雖會有過一段美麗的遠景，然而，這遠景却不久便被無情的事實所幻滅了。首先，二百比一的鷹鷹，在勝利以後，人民的原有貨幣，却已無形中成了廢紙。在「接收」尚未到來以前，市場的流通，幾乎成了「匱乏」。人民在「生存」第一的逼迫之下，便不得不以忍痛的心情拿出不知積存過若干年的「銀洋」。一直到現在為止，法幣的數目，雖然在市場上比以前有了無比的增加，然而，銀洋的流通，却依然佔據優勢。在開始的時候，銀洋的流通，是按照法幣的標準，譬如說，當銀洋每塊是法幣四百的時候，買一萬元的貨物，則折合二十五元銀洋。而於今，法幣的流通，則是反過來以銀洋為標準。縣城的房租是以銀洋為標準，土地的「現」租，也是以銀洋為標準，一般商場上的交易，人們在心目中也早已有了一個標準，物價變動的是法幣的比例，而不是他們的「銀」本位。目前，甚至於行「賄」，也不能不用銀本位。前些時，我們一個達官的同族，為了一場「官司」，要向讀者說明的就是：這些銀洋的使用，並不是出於一般的富有的，或者從此就認為今天的農村並不窮困。相反的，這話表現了這個社會的危機的充分暴露。誰都知道，銀洋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血汗的結晶，中國

人富於貯蓄的個性，是早已聞名於世的。而我們這個縣城，由於地理環境的偏僻，一向是比較富裕的。境內湖沼交錯，大部份的土地靠近長江，農產品幾乎應有盡有，主要的是：米，棉花，芝麻，貯麻，麥，豆等。而根據近年來的調查，境內的「煤」，亦略有分佈。故歷年以來，人民的生活，祇要天災人禍不太頻仍，總還是過得去的。有時人民自然也還有點積蓄，可是，由於土地面積的有限，於是這積蓄便大都集中於「銀洋」上了！於今，這積蓄自然是全部被「城」裡的人。（當然是少數呵！）刮了去。可是，人民在多不勝舉的「捐」「稅」之下，窮困的結果，便不得不向高利貸者伸出了求援的手，在法幣信用日益跌落的過程中，高利貸者為保護其幣值起見，多以銀洋為借還的標準，現在，借用一百銀洋，一個月後最高有達到一百卅元的事情，這是多麼骇人所聞的事件。痛心的是：借款的主要原因，大部份除了是為了春耕，播種等事件而外，有時竟用之於訴訟，打官司等上面去。自然，農民們為了解付不起其欠債，有時自然也以土地作抵押的。不過，目前更為流行的一種借貸方式便是「賣青苗」。即在青黃不接之際，農民們將自己的農作物，預為賣出。其賣價僅及付款時的二分之一左右，現在雖正是清明節季，但農作物的收穫，尙沒有預期的把握。故目前此種青苗線的市場，還沒有完全出現。據估計；目前谷子每石的價格是賣百萬元左右，而讓賣中的谷帳，大約不出每石六拾萬元，等到新谷登場時，自然更不止這個價格。所以，為時不及兩月，而廣利却在兩倍以上。這在我們鄉下，就叫做「放谷帳」。與這個情形相類似的尚有「芝麻帳」、「棉花帳」等不一而是。這雖是一種高利貸的剝削，然而，事實上，能够到得手的人家，並不算多數。所以，農民的第一困，實在可以說是到了空前的程度。即使是一豐年吧，除去了這些欠債以外，實在不能再有什麼存貯。有的甚至於全年的收成，都已被入「預約」一空。就在「赤貧」之下，人民的負擔，不僅並未減輕，而各自繁多的捐稅之下，人民的負擔，不僅並未減輕，而各自繁多的捐稅，比起「戰」時或「戰」前，都有了無比的增加。徵資之外，有時還得徵購徵借，老實說，沒有特殊勢力的小地主，也並不怎麼好過。政府每一個美好的法令，都成了剝削人民的工具。譬如說，除了數不清的正稅之外，

還有地方的教育費，就是用以興辦縣立中學與各保國民學校的；這項費用，一般農民既負擔不起，而其子弟們，實在說來，也沒有上學的興趣。忘之，雖然在這並未涉及內戰烽火的縣份，人民生活窮困的程度，實在是已到了空前的境地。

窒息了的正當商業

再看縣城的一般商人，並都遠不如前。資本小一點的，主要是靠「折息」過日子。在上面所曾經提到過的「銀」本位之下，這種折息的債務，實在是非一般貨品的漲價所能趕得上的，所以，倒閉的情形，是時常發生的。至於，資本大一點的商人，如果沒有特殊勢力做後台的話，也難免不走上日暮西山之途。除了數不清的從保甲那裡派出來的捐稅之外，主要的還有貨物稅，印花稅，進口稅等不一而足。而最麻煩的是最後一種捐稅，沒有定額，當貨物從漢口運到岸上時，憑稅局老爺們的靈感，隨便規定一個納稅的標準，說多少就是多少。自然，有勢力與有來頭的不在這個範圍以內。而最近，除了這些捐稅之外，還加上了一些新的無妄之災。那就是新近成立的「合作社」與「縣銀行」。合作社是由省政府發下來的一筆資本與從各商家遷派而來的款項開設的，這個社的社員，表面上是有理監事的選舉，而實際上則是由少數人所包辦操縱。凡是這個社所經營的業務，如鹽，煤油等，其他的商人是不准經營的。至於他們所根據的法令，那極有大體得。自然，他們是用不着納任何捐稅的。另外一個「縣銀行」，說起來應該是由活動地方金融的，而其實却成了少數人的特權。首先，資本的收集，大部份是從各商家那兒遷派來的。「不出不行，這是政府規定的組織。」老實一點的商人，在這種脅迫之下，也就極好惡惡的拿出了自己的資本。可憐，在物價如此高漲之下，拿出法的數額，經過了一年或半載以後，所淨得的利息，往往即成了一種誇張與近乎開玩笑的意味了！而相反的，這批少數把縣銀行的人物，却可大為利用這批資本來坐以發財了！據說，這位本來擔當窮困而又什麼都不懂的「行長」，在一年之內，居然發了近百萬的財了！這個數目，在這個小小的縣城裡，實在是相當可觀。難怪這位行長今年過陰曆年

時，請起賜客來，一下就是五六十桌了！（酒席是從館子包的，每席約九十萬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何等諷刺的對照！

亂世出英雄

要是說抗戰「勝利」以後，我們這個縣城完全沒有變動，那也並不盡然。譬如說，原來一般老讀書人當紳士的，於今由於「附逆嫌疑」的關係，却換上一批年青的「少年班」。這批朋友，包括抗戰後解甲歸來的鄉軍人與一般「地下工作者」，政府爲了崇德報功，便不得不設法來安撫他們。據說這些勇士們一回來以後，便集合了十來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一次談話會，自然，這就分妥了各人的勢力範圍而向縣政府提出了「合理」的要求。即使有一兩位偶而失意，但有了做官的朋友，不也就自然的成功爲有力的紳士了嗎？自然，由有這些先生們在數倉時代會經努力「抗戰」的結果，也就沒有一位不被耽誤而能讀完高中的。甚至於有一兩位連小學都沒有讀過，然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至於那些大學畢業回來的人物，由於他們「不懂世故」，找不到事情，還是活該的嗎？記得我們這次「復員」回來的五個大學畢業生（三個西南聯大的，一個東北大學的，一個中央大學的），原本頗有在故鄉大展一下宏圖的信心，可是，結果看看局面，竟無插足之地，當然，有很多位置，儘管可以「發財」，而這些人畢竟還有點「清高」之感，是頗不屑與聞的。事實上在那樣一個環境下，要想跟他們不合作而能做好一點事，那是決不可能的。聯大畢業的一位某君，曾主持過縣立初級中學一個時期，後來由於地方勢力「保送」學生的不遂，而終於命運。有兩位找說擁擠在京滬一帶，有一位甚至連信息也沒有了！難怪我們的家長與親戚們說：「早知道你們如此無用，真不該送你們讀大學呵！」苦笑之餘，我們這批「無用」的人，還有何話可說呢？信哉！亂世出英雄！

瑞 典 觀 感

本刊特約記者

這是我第二次來北歐。然而上一次的旅行，我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丹麥去了。這一次我全部的時間則花在瑞典。英國自從去年九月間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即不准居民帶貨幣出境。我雖然身邊一錢莫名，但因了瑞典朋友的愛客，我得在瑞典住六個多星期，遊四個大都市，看好多個鄉村。同時因這次我的瑞典文講得辭可達意，因之除了接觸一些藝術家與政客外，還可與一般平民談些閒話。我的印象，如果用一句話概括起來，那就是：

「我喜歡這個國家。」

瑞典的面積，跟法國差不多大，但人口則只有六百多萬，換一句話說，上海的人口幾乎等於瑞典全國的人口。這原因是：瑞典可耕的土地不過只全面積百分之十，其餘的土地大半是森林和礦山。在瑞典沒有工業化以前，人民的生活水準低，衆人經常移居到美國去。但自從第一次大戰後（瑞典中立），牠即很快地工業化起來。人民的教育程度也同樣地被提高了。因之一般人都節制生育，人口得以保持平衡。因爲人口不多，國內的礦產又豐富，瑞典的一切事都好辦。在政治、文化、經濟生活方面，瑞典在世界上保持最高的水準。

瑞典雖地在波羅底海邊，與蘇聯隔芬蘭對峙，但瑞典人的性格及文字則與德國相近。德國人沉着，富幹快幹，硬幹，瑞典人也有這種精神。瑞典人所不同的是他們有長期的議會民主制度的教養，沒有民族的誇大狂。他們最幸運的是在上一個世紀，他們沒有趁火打劫地擰殖民地，以致沒有被捲入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但他們却利用上一世紀科學發明的成就，來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同時因爲避免了更大的大戰，他們可能省下大量的軍費來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

教育在瑞典之發達，世界上恐無其他的國家可以比得上。中小學教員的待遇，恐怕在世界上也最高。當我住在瑞典的第三大都市馬爾莫（Malmö）過聖誕時，我的主人即爲一個中學教員。他在中學已經教了二十年，他的薪水並非是從學校的出納股支取，却是經他的

人，每年約由三百鎊到六七百鎊；後一階級的收入每年約由一千鎊到兩千五百鎊。但一般人的享受都很舒服，而生活却沒有奢華的表現，也沒有此可能。這原因就是因爲政府所辦的公共事業好，如交通，學校，醫院等都是很便宜的。小孩子在沒有達到十七歲以前，每年都有政府津貼。老人每年也從政府領到足夠生活的養老金。在這種制度下，當乞丐是違法的。因之一般人看起來衣冠都很整齊，社會的秩序也極安定。在公共的場所或車站，東西可以隨便放而沒有人拿去。在鄉間沒有什麼人在晚上鎖起大門睡覺。孔夫子說的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我記得小時在中學念黨課時，讀到孫中山先生所引的「禮運篇」，總覺得「大道之行也」是一個太高的理想。那知這「理想」，在這兒是鄉公所裏的小職員所應有的超然常識。我們如果還把高唱人雲，認爲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哲學，則不免要見笑大方了。據我個人的觀察，要實現這個「理想」並不難。主要是經濟民主化，有計劃，有辦法。然而先決的條件是，則必須政治清明和民主化。

瑞典雖地在波羅底海邊，與蘇聯隔芬蘭對峙，但瑞典人的性格及文字則與德國相近。德國人沉着，富幹快幹，硬幹，瑞典人也有這種精神。瑞典人所不同的是他們有長期的議會民主制度的教養，沒有民族的誇大狂。他們最幸運的是在上一個世紀，他們沒有趁火打劫地擰殖民地，以致沒有被捲入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但他們却利用上一世紀科學發明的成就，來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同時因爲避免了更大的大戰，他們可能省下大量的軍費來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

教育在瑞典之發達，世界上恐無其他的國家可以比得上。中小學教員的待遇，恐怕在世界上也最高。當我住在瑞典的第三大都市馬爾莫（Malmö）過聖誕時，我的主人即爲一個中學教員。他在中學已經教了二十年，他的薪水並非是從學校的出納股支取，却是經他的

擇子到政府辦的郵政預金局領取。換一句話說，瑞典的公立學校當局，只辦教育行政，不弄經濟事項。

中學教員的待遇既如此好，很明顯地，當一個中學教員在瑞典不容易，第一，他須有碩士的學位。之後他得試教一年，由三位老教員試聽，認為合格後才得被正式任命為教員。此後他的生活安定，一生即以教書為業了。由此可知，瑞典的中等教育發達，却並非偶然。

瑞典政府近十年來，一直是由工黨當權。我在瑞京斯托克霍爾姆時，曾在國會的下議院內去旁聽了一小時。議員中有五分之一為女人，他們大多數都是過去各種社會裏面當書記之流的人物，表面看起却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但無疑地，他們的政治經驗非常豐富，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內政與外交方面的設施看得出來。在蘇芬戰爭的時候，瑞典有頗嚴重的納粹運動，但政府很快地就把牠根除了。在外交方面，瑞典因為處在蘇聯和西歐國家的中間，地位非常困難，而且國家小，人口少，經不起一個戰爭；所以瑞典始終是小心翼翼地爭取中立的地位。比如，當美國國務卿提倡援蘇計劃時，瑞典即全部擁護，因為這在經濟方面對瑞典有利。但當英國外相及邱吉爾最近倡議建立西歐集團時，瑞典即明白表示不參加，因為這帶有軍事的風險性和反蘇聯的嫌疑。

瑞典與我國可說是互有宿怨。過去瑞典曾派兵遠征過俄國。而沙皇，因為想突出波羅底海而獲取可以直達大西洋的海口，也時常在打主意征服瑞典。此外隣邦芬蘭有一個時期曾屬於瑞典（至今芬蘭尚有一部份人口講瑞典話，在文化方面屬於瑞典的傳統），現在又落到俄國的勢力範圍內去了。瑞典對於蘇聯當然免不了有些害怕，起居亡國的疑慮。此外瑞典與蘇聯同有一個思想之爭。這兩個國家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但瑞典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的工業化，高度的人民教育基礎上面。瑞典全國已經是電氣化了，比建立在用煤的英國工業，還進步了起碼十年以上，比蘇聯的工業，當然是更進步得多，因之瑞典工人與農人的生活享受比蘇聯的

工業為高。在原則上，瑞典有許多工人相信共產主義，但在事實上，他們決不願過蘇聯工人同樣水準的生活。這是一個矛盾。這矛盾也使我們看出，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個世界性的主義，但牠也受各個民族國家特殊環境的限制。

換一句話說，各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有牠獨立物質條件，和獨立的問題要求解決，因之也應有牠獨立的內政外交的國策，來適應牠獨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固然有牠的世界性，但牠的民族性比什麼都重要。

因為人口少，在文化活動方面，當然沒有大眾的人。作家，藝術家，音樂家以及記者等，數目極為有限。當我在瑞京時，我的「賣文經紀人」為我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瑞京的幾個編者和作家都到了，但一共不過二十人。所稀奇的是，瑞典的報紙，及出版的書籍特別多，而且銷路並不比在英國的為少。但仔細分析一下，大多數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是翻譯。世界各國文學的翻譯，此間差不多都可以看得到，連林語堂的書籍及老舍的「駱駝祥子」包括在內。瑞典報紙上的消息也比英國的報紙所登載的為多。我在此六星期，就見到四長篇關於中國的特約通訊。關於蘇聯的消息，瑞典的報紙及無線電差不多每天都有報告。這在英國是不容易見到的，這原因我想是：（一）瑞典的紙多，（二）瑞典的國家小，國內的新聞有限，（三）人民的教育程度高，對世界的興趣濃。

在這兒，物質生活跟美國差不多，但精神生活則完全兩樣。瑞典人不喜歡講話，拘謹，禮節多。在美國住慣了的人，頗覺得瑞典人的拘泥有些多餘和好笑。但瑞典人非常愛客，尤其是外國人。可是他們用錢却非常謹慎。在家庭內，夫妻兒女間的經濟都是界限很分明的。這道理是：瑞典的社會有秩序，一切事業及職業的收入有限制，人民無發財的機會，非謹慎不可，此外家庭內各人的經濟分明，大家不互相倚賴，各人的擔負有限。如此貧污既不可能，而也沒有貪污之必要。因之瑞典人（在這一點，英國人也相同）對人與人之間的概念，跟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概念完全兩樣。我記得有一個記者

問我說，在中國過年或過節時，要人們常豪爽地用金錢賞給下屬，或送給死去了的朋友的家屬作為「報償」（因此我們的報紙反迴諷罵我報關，也就大肆地表揚！）那麼這些要人們的薪水究竟有多大呢？他的結論是：我們的測人們一定有不正當的方法掙錢，否則決不能如此幾立刻就抵消了數十篇關於中國民主化的文章。

我這次在瑞典身邊未帶一文，從這一家吃到另一家，從這一地搬到另一地，除了瑞典的國家廣播电台給了我一點廣播稿費之外，我全是由朋友不幫忙。因此我對瑞典人發生了濃厚的情感。現在臨別在即，我不禁有點中國人所特有的感傷情緒。這使我記起了十多年前與我用世界語通信的一位瑞典小姐。我在東京時，因寫文章不幸，被日本警察打入牢獄，她的地址也因此遺落。但我尚未忘記她的名字，因此我寫了一封信給她。幸運地她居然找到了她。第二天我還睡在牀上時，就接到她打來一個電話。我雖然用世界語寫了兩部小說，這十年來，我却把牠忘得精光。她因了戰爭起，也對「人類」失望而忘了這個語言。我們在電話上支吾了好久，才互相了解。她現在已經結了婚，成了家庭主婦了。她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居然能到她這個在北極圈的國度裡來。她以為我早被戰爭消滅了，人生真有夢像夢。我接完電話後，不禁笑了起來。

現在我又回到瑞典極南部的那個城市馬爾莫來了。我住房的窗子俯視着分隔瑞典與丹麥之間的北海海峽。我可以隱隱地瞧見到彼岸的丹麥京城哥本哈根。我去年在那兒住了一個值得紀念的夏天。在那兒我遇下一大批的丹麥朋友，我只須乘四十分鐘的渡船就可以去拜望他們。但因為簽照等種種手續的限制，我無法如願以償。歐洲是如此樣小，而開埠却如此頻繁，便把人類分隔成爲種種不同的集團。像這樣，我真懷疑，世界和平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柏林那趨文藝

蕭乾

我對自己性命沒有太擔心過，可是由福蘭克福到柏林的途中，我不知說了多少遍「完了」，這回可真完了。由巴黎出發，一架C-46型的運輸機，祇有我和兩個異常沉默的美國軍官。（路上我納悶着）他們是受了長官中斥，還是口吃，還是負有機密使命呢？這是距德國投降兩個月光景，我趕去探訪波茨坦會議。一路上幾乎都穿在灰云霧之上。偶爾雲隙裏露出些地面，不是鐵道的殘肢斷臂，便是變成了破碎的村鎮。馬恩河，薩爾河，一條條蛇般爬過；在叢鬱的森林丘陵中，還因河出現了。飛機在這哥德故鄉的山谷上空盤旋了一匝，便落了地。福蘭克府！

馬達還在轟動着，機門便為人敲開了。由窗口一望，地面上翻動着，撕裂着一大片草綠。一個把頭盔歪到後腦勺的下尉用雙手捲成筒形，對准了機首的駕駛人嚷：「哪都裝下了罷？」我再端詳一下那片草綠：四十個人總有；而且個個背上是行囊。心裏想，僅僅五十頂鋼盔就夠受！怎麼想，駕駛人或者稱一稱重量，或者（照東方辦法）把人數折半罷！不。駕駛人大約做了個手勢，於是，四十個旅客就全翻行套餐湧而上了。所有長條座位佔滿了後，中間又塞了兩排。我想到安南的四等車廁，我想到上海的電車。我也想到以科學精確性聞名的美國。

油在加，人在擠。起飛時，地面再不如巴黎那麼滑動了。翅膀擺着，機身搖擺着，好像我還聽到馬達報怨，似地喘息，然而機中的草綠G.I.們唱着歌謡笑着——比較着萊茵省與布魯塞爾姑娘的價格和品質，也誇說着各人「解放」的成績。飛機一降一昇地，慶托在苦撐着。墮翼下是無際的森林。我的頭埋在草綠的綿中，想着我們是跌在美區還是蘇區的家國。然而那時一陣火燄，人成了焦炭，那還又有什麼分別了呢？

一小時光景，作為美蘇分界的艾勒伯河以蜿蜒的姿

態出現了。在東北的天際，便是柏林。這思想的不斷呈現，對我自己是莫大的安慰，我開始打算到了柏林應如何如何，雖然心坎上也泛着一個假設：如果今天飛機不因過重而失事的話。

不必贅贅，飛機沒出事，不然，三年以後我就不會在上海江灣寫這回憶了。柏林，這中歐暴君的王座這神經與血肉戰爭的核心，這秘密武器的製造廠，這軍千百轟炸機的目標，這柏林，出現在夜幕下了。這一片，像垃圾坑，那一片，像掏過蜜的蜂巢。躺在地面上的，真是一具千孔百瘻的龐大屍身。

田波羅夫機場，這曾經歷過多少效忠的傀儡，多少軸心奸雄，經歷過多少歷史性的大事的起落場，如今是在四國共管下了。指揮塔上飄着蘇美英法的國旗，牆上殘舊的德文標語上，已塗起嶄新的俄文。

因為我的隨軍記者證是美軍總部發的，下了飛機，便披一羅吉普載往美佔領軍的聯絡官辦事處（PRO-Public Relations Officer）。這是怎樣個國都呵！一條近雨英哩的街道，（波茨坦街），殘斷的牆，焦點的磚堆叢中，是臉上充滿沮喪和恐懼的人。街道上稀疏的歸宿，一個個提了隻口袋或籃子，用疑惑的眼睛四下瞭望，（殘餘的店鋪也都關了門）顯然是在覓食。

在巴黎，美好的雪白麵包和本地人木屑麵包比起來，已是天上人間了；這裏，豐食與餉飯之外，還有自由與奴役的對照，一到了PRO，便拿到配給處（P.X. Post Exchange）的執照：巧克力袋十包，香煙兩盒，胡鬍子刀一打，白酒 One 半瓶，威士忌一瓶。聯絡官給我個地名，說：記者先生們，你們今夜將睡在柏林的樹林，書舖咖啡館，飯店，雖然有的關了門，有的寫明軍徵用，處處却都是往時閑逸舒服的痕迹。我住的正多爾夫也是個大都市裏理想的住處：寬大的街道，幽靜的樹林，書舖咖啡館，飯店，雖然有的關了門，有的寫明軍徵用，處處却都是往時閑逸舒服的痕迹。

對柏林城的印象嗎？大得怕人！由美蘇區分界的博爾登堡門沿了動物園直到英佔領軍司令部的阿多爾夫，吉普一直在可以六七輛平行的寬敞馬路上驟馳。動物園的樹就如噩夢裏的枯枝一樣，都长得枝繁葉茂。紀念碑的紀念碑上，已調刻地顯起了三色旗。柏林的街比皇家派頭的北平西長安街，比巴黎的Champs Elysées，比華盛頓國會前街，既寬，既長，而是怎樣單調，怎樣拙笨的寶長！所有樓房都那麼四方方的大塊頭，而且差不多是一片灰色。倒是炮彈在平地上給描出參差。

在大使館見到剛從歐洲六七年的同學，那愉快是不用說的。說着怎樣迷我（我用倫敦那邊的經驗來比較對照着），怎樣被納粹不時搜查，動不動就問「你是南京的中國人，還是重慶的中國人？」（有一回，一個已解

女孩由門口探進頭來。一聲「請」，她咚咚走到我跟前，胸前掛了一幅還未乾的水彩。

「這是媽畫的，萬國！」她舉給我看。「這幅問

這個你看了多少根香煙？駕駛香煙？」

我伸了夕陽她看，湖上是白帆船，遠樹遠中是些屋頂。色看得淡得出體，筆致也疏朗可喜，女孩指着屋頂說：「那就是波茨坦的無敵宮。爸爸說，我的命運就將在那裏決定。」

我給了她一包香煙，要她把水彩拿回去，謝謝她的媽媽，並且說，多少枝駕駛香煙也不够買一件藝術品的。

沒有比一個曾經到過天津的人更能欣賞柏林的了：吉普剛走一英哩，面前一個白木牌：「對已離美界」。果然，前面不見了戰鬥的美索和德營了。指揮交通的都是廿歲左右的蘇聯女警察。黃味醜的制服綠領帶，一個側短而豐滿得富彈性。她們兩手各拿紅綠二旗。如果南北逆行，紅旗便九十度直指東西，車由交通機關跑過，她還能在紅綠旗外又添出一隻手來，敬個禮。又英武又威風，又敏捷，軍帽下露着一撮海髮，閃耀着斯拉夫的亮眼睛。「健康的美」，吉普跑過去。和第一個想頭。還想到了第四十一中的那位女英雄，極不曉得交通警下了班也屬「美的」不。

來是採訪波茨坦。我的日程是上午去看僑胞和同學，下午去看看波茨坦。看僑胞自然先得去估福深達的大使館。

對柏林城的印象嗎？大得怕人！由美蘇區分界的博爾登堡門沿了動物園直到英佔領軍司令部的阿多爾夫，吉普一直在可以六七輛平行的寬敞馬路上驟馳。動物園的樹就如噩夢裏的枯枝一樣，都长得枝繁葉茂。紀念碑的紀念碑上，已調刻地顯起了三色旗。柏林的街比皇家派頭的北平西長安街，比巴黎的Champs Elysées，比華盛頓國會前街，既寬，既長，而是怎樣單調，怎樣拙笨的寶長！所有樓房都那麼四方方的大塊頭，而且差不多是一片灰色。倒是炮彈在平地上給描出參差。

拿到配給的中國同學，盡爲了一片赤忠，說是「重要的」，開始又被納粹反徒由家中硬奪回。」上下打量着這頂中過一隻炮彈的三層樓，僞大使（王揖唐的兒子）已逃往西班牙了，滿地狼藉是汪記的燒謹照——青天白日旗上斜掛着一塊象徵王道的燭黃。

坐下來大家談道去，談未來。「希特勒這小子有一手，柏林的電車開到最後一天。」「柏林的地地道車太淺，中彈就通。中國要做地道車可得做深點。」「納粹這裏壞透了，可是德國人民還是好的，特別開公寓的下等階級。對中國人真好！」「我的家嗎？誰知道他們在那裏？」「教育部得想點辦法罷！我學的是醫，他是建築工程。我們回去有用，這裏天天時間不來找吃的了。」「你看，密斯特斯，國共這回可以和了罷？」「和了多少好！」我說，黃浦江一定得有座橋。這麼多年了！他媽的，誰的政府也好，我一定去修，當小工也幹。」咖啡其實大半是不屑，但是喝來興奮。十八張，二十三張，三十張臉（門一開就添一張）張張掛的是與舊社會的眷戀，想念。大家談着香港的收回，談着海南的開發，談着德國，連納粹的範圍，也有些什麼可取的，（如對孕婦的優待接濟）。一個河南同學也頓開說：「除了秘密警察和集中營，德國還有可學習的，譬如——」這時另一位揮嘴說，「秘密警察和集中營就是手段，底是症候；目的呢？病因的是維持老希臘的實業呀！德國效率高，這是實情，但如果根本動搖壞了，效率愈高，罪惡必愈大。我看我們要工業化、要計劃經濟，我們可以另外幹，不必再學老希的乖！」

話由猶太組織轉到日本時，有人提議去日本大使館走一遭，說我穿了軍裝，進去是不成問題的。于是，在兩位同學領導下，我們便馳往動物園去了。

英美的轟炸機多有眼睛！把他們自己的使館炸個平，中國的中了一彈，日本鵝黃色的館址除了三樓屋頂一個窟窿外，在一片廢墟叢中，也說得起完整無缺了——有之，是聯軍的「解放」。這裏一個保險櫃啓開了，那裏一隻照像機砸到了盒子。能開開或關閉的抽屜，都光光了，沒價值的物件地滿滿地。價値原是相對的。日使的通行證，和家庭照片，說不定還有妻子的紀念品，也算是一「無價寶」的垃圾。」令人欽佩的是使館的藏書，在接待外賓的二樓，是曾經譯為日文的所有德國文學藝術，自然與社會科學的著作，使一個德國人見了便因日人之愛文化，擅文化，而生了交情（中國駐美大使館可有一部林琴南，嚴復，更不用提近人的譯作！）所

「，開始又被納粹反徒由家中硬奪回。」上下打量着這頂中過一隻炮彈的三層樓，僞大使（王揖唐的兒子）已逃往西班牙了，滿地狼藉是汪記的燒謹照——青天白日旗上斜掛着一塊象徵王道的燭黃。

坐下來大家談道去，談未來。「希特勒這小子有一手，柏林的電車開到最後一天。」「柏林的地地道車太淺，中彈就通。中國要做地道車可得做深點。」「納粹這裏壞透了，可是德國人民還是好的，特別開公寓的下等

有著作都是牛皮精裝的。在對內工作的三樓，也有三間打通了的職務室，那是怎樣不同的內容！不但沒有了牛皮裝，有時甚而是報紙的草稿。那裏藏的是全德的地圖，全德工廠的調查，是新發明的探刺，是種種秘密的報告！細密地分類，包裝着。

這時，三樓正有人用錐子破壞玻璃。同學說，有些保險櫃是預先放好炸彈的，人真要錢不要命！於是，我們便匆匆走開了。

四

波茨坦在柏林的西南，大約四五哩的光景。城因為很小，挨炸的半度照比例說，好像不在柏林以下。柏林去波茨坦，可說是由廢墟進入廢墟，祇是二城之間，不倫不類地橫隔一段沼澤的野景。那便是萬湖和哈威河。稀疏的遠樹，靜止的湖面，一如小女孩兒我的看那幅水彩。天邊這時斜掛了一抹灰雲。

穿行着波茨坦的涼涼街道，望着斯拉夫女郎的歡聲，我思憶起拿破崙大帝的當年。滿想這麼可以衝入無憂宮去，像沃爾泰一樣與巨頭的先鋒促膝談心，不料離宮門還好遠，（僅僅望到一座臨樓的屋角）戍兵便把我們攔住了。掏記者證，拿片子，怎樣也不成。戍兵並且說，從明大起，連波茨坦城周圍三哩也不許進出了。失望之餘，我好好盯了那屋角一眼。那是我唯一的眼波茨坦。

當德國的主婦們滿街送過食物的時候，我們這近五十個記者，由英，法，美，比，荷，華等等不同角落跑來的記者，便開始徵取「巨頭」們的新聞了。有人在飛機場上守候了一個禮拜，居然一天看見戰鬥機的杜魯門由飛機上跳下來。又有在蘇區一個缺口遇到瓦吉爾及其女兒瑪麗，正在吃了雪茄，走路轟炸的殘跡。這難聞會僅僅一天了，斯太林還沒有踪跡。有人說他已來了。又有人證明沒有，因為通過東德的火車兩旁還隔著磚牆即是哨兵，沿鐵道的住宅還不許開窗口。

終於，一天早晨，在聯邦官的招待會席上，他宣布

一個批評美國聯絡官的電報，說這種「情報」真是荒謬絕倫。第二天聯絡官就走了臉走進來。把要宣讀的「新聞」往桌上一擺，雙手在胸前盤起，便問：「諸位記者，你們還要不要這個招待會？」大家莫明其妙。聯絡官說，「你們中間有人批評了我。好，你們去探所開好了！」座中有人站起來問：「指誰說的。那個倫敦記者說，你們連波茨坦的空氣也要不着。這個你們是知道的！」座中有人站起來問：「指誰說的。那個倫敦記者馬上說，「你們中間有人批評了我。好，你們去探所開好了！」

這時，三樓正有人用錐子破壞玻璃。同學說，有些保險櫃是預先放好炸彈的，人真要錢不要命！於是，我們便匆匆走開了。

四

波茨坦在柏林的西南，大約四五哩的光景。城因為很小，挨炸的半度照比例說，好像不在柏林以下。柏林去波茨坦，可說是由廢墟進入廢墟，祇是二城之間，不倫不類地橫隔一段沼澤的野景。那便是萬湖和哈威河。稀疏的遠樹，靜止的湖面，一如小女孩兒我的看那幅水彩。天邊這時斜掛了一抹灰雲。

五

在這無聊時際，我溜出去做了些關於軍事政府和總政委的採訪。（見當時的大公報）也在著名的威廉街盤桓了大半天。那是德皇的居處，如今被佔領回來。那裏戈培爾博士製造過謠言，希姆萊散播過恐怖，希特勒一幕幕扮演過歐洲新秩序。如今戈博士的宣傳部已成為一場紛爭的勝利者。希特勒一暮幕劇場被擋起，他多多少少是個眼福財！僅於昨天那場戲，希特勒在講壇前招搖撞騙，竟被擊碎了。一個說幾句英語的德國人站在講壇前招搖撞騙，代價是變根有史。他能在劇場裏指出那裏是奸細網。代價是變根有史。他在劇場裏指出那裏是奸細網。代價是變根有史。

在這無聊時際，我溜出去做了些關於軍事政府和總政委的採訪。（見當時的大公報）也在著名的威廉街盤桓了大半天。那是德皇的居處，如今被佔領回來。那裏戈培爾博士製造過謠言，希姆萊散播過恐怖，希特勒一幕幕劇場被擋起，他多多少少是個眼福財！僅於昨天那場戲，希特勒在講壇前招搖撞騙，竟被擊碎了。一個說幾句英語的德國人站在講壇前招搖撞騙，代價是變根有史。他能在劇場裏指出那裏是奸細網。代價是變根有史。他在劇場裏指出那裏是奸細網。代價是變根有史。

當廉街最吸引人的自然是希特勒起居辦公以至自殺成爲紀念品的辦公室，那裏是原員總發記處。*Chancery*，也是這些比較完整的建築。如今已變成炮彈的臉上染了些灰，僵硬的臉上還凸出來亂跳，它

在一個逼着地窖的入口，站着一個蘇聯戍兵。倚了槍，茫然地眨着灰藍的眼睛。由於我便知道我是中國人後，便熟練地在我身上抓了一把，然後向那黑洞洞的銅像的臉上擦了些灰，僵硬的臉上還凸出來亂跳，它

在一個逼着地窖的入口，站着一個蘇聯戍兵。倚了

槍，茫然地眨着灰藍的眼睛。由於我便知道我是中國

人後，便熟練地在我身上抓了一把，然後向那黑洞洞的銅像的臉上擦了些灰，僵硬的臉上還凸出來亂跳，它

在一個逼着地窖的入口，站着一個

書評

婚姻向何處去？

生育制度 費孝通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二百頁

吳景超

生育制度，是費孝通先生於抗戰期內在西南聯合大學及雲南大學開授的一個學程。他在這個學程中的講稿，在六七年中，不斷的補充修正，於抗戰勝利後才付印。費先生的書，我讀了已經不少，但這一本書，無疑的是後來居上，在他所有的社會學著作中，要算最有貢獻的一本。就在中國的社會學界中，過去二十年內，雖然不斷的有新書問世，費先生這一本書，內容的豐富，見解的深刻，很少有幾本書可以與他站在同一水準之上。

潘光旦先生在本書的長序中曾說：「本書的整理的輒邁軒豁，剖析的鞭辟入裏，萬變而不離功能論的立場，章法井然，一氣貫串，未始不是一家言的精神的充分表示」，我對於這種欣賞的話，完全同意。現在贊借這個介紹本書的機會，提出書中幾個重要問題來，與費先生及讀者商榷。

(一) 婚姻的基本及功能

談到婚姻制度，一般人的心目中，總以為婚姻是為滿足性生活而設立的，他的基礎，是建築在古人所謂「食色性也」的色字上面。但是作者的看法與此不同。他說：「人類性慾的滿足，即使沒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樣是可以得到的。」(頁三)「在很多人民中，兩性關係，並非以婚姻為主，也並不限於夫婦之間，而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夫婦之外的性生活，無論如何自由，並不會引起婚姻關係的混亂。這使我們覺得婚姻關係和兩性關係並沒有絕對的聯繫，因之，我們似乎不應把限制兩性關係，視作婚姻的基本意義。」(頁三十)「單性的衝動，和男女的私情，並不足以建立起長久合

作撫育子女的關係來的。若婚姻的意義不過是男女的結合，或是兩性關係的確立，則婚姻不但是一件人間的私事，而且不必有很多人為這事加以準備了。可是在任何地方一個男子或女子要得到一個配偶，沒有不經過一番社會規定的手續。」(頁三五)這幾段話，說明婚姻制度的產生與維持，並非專為滿足人類性生活的要求。兩性間如只為着要得到性生活的滿足，可以不必有婚姻制度。

許多社會學者，都是這樣看法的。像孫末楠與凱勒(Summer and Keller)的說法一樣，作者頗看重婚姻的經濟基礎。婚姻是人類分工合作的最基本的單位。「人們好像是任何差別都能利用來作分工基礎的，年齡，性別，皮膚的顏色，鼻子的高度，甚至各種病態，都可利用。性別可說是用得最普遍的差別了。以現在為止，人類還沒有造出過一個社會結構，不是把男女的性別，作為社會分工的基礎的。」(頁三五—二六)

作者雖然看重婚姻的經濟基礎，但他並不像若干社會學者一樣，把婚姻看作一個經濟的組織。分工合作，是婚姻的一種功能，但並非主要的功能。婚姻的主要功能，是在以永久共處的方式，來共同擔負撫育子女的責任。作者對於這一點，在本書中曾三番五次的說明。他以為：「我們與其說：因為兩性的愛好，所以願意共同撫育兒女，倒不如說，因為要共同撫育兒女，兩性間需要有能持久的感情關聯。」(頁二五)「每一個社會所容許出生的孩子，必須能得到有人撫育他的保證。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撫育團體必須先已組成。男女相約共

同撫育他們所生孩子的教育，就是婚姻。」(頁三〇)「人間所以有夫婦的結合，無非是為了要使孩子們能得到適當的撫育。」(頁四〇)「婚姻是人類的確立關係撫育的手段。撫育既是不可避免，所以人類的問題，是怎樣可以最有效的撫育。婚姻的方式，就依這標準來決定的。」(頁七五)

這種說法，特別注重婚姻的家庭基礎。人類婚姻史的作者衛司脫麥克(E. Westermarck)早就提供這個意見，可是因為這種看法，與常識的看法不大相同，所以不能為一般人民所採納。但是從學理方面看去，這種主張，實在是顯撲不破的。中國過去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與媒妁之言而成立的，從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看來，不大合乎理性，但如把婚姻看作滿足性生活，經濟，及撫育子女三種功能的混合制度，那麼中國過去的婚姻之極其合理的。只有把一種新的功能，即感情生活的滿足，也放進婚姻制度中去，然後中國過去的對法，才似乎是不合理。但是滿足感情生活功能，很少有幾個社會，認為應由婚姻制度來擔負。現在的人，把他看作婚姻制度的中心功能，是使婚姻不能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們留到下面再談。

(二) 生育制度的功能及性質

我對於作者說婚姻的成份，大體上是同意的。對於講家庭的部份，有好些地方，我們的觀點，就有點出入了。作者對於生育制度的功能，據我的了解，是偏重於經濟的解釋，而且是站在社會的觀點去分析。他說：「社會分工結構，靠著人發生作用，可是人不能永遠生存

的。他不久就要死去。當然，從個人的立場看，他一死之後，正可以不必管天下興亡了，正是吹噓一滴春水，干涸底水。他死後社會結構發生什麼困難，他太不了解了。可是在他未死之前，若是別人「一批一批的死去，社會分工合作的完整性，不能維持時，他的生活就會發生困難。這些活着的人，却不能不關心別人的死亡。他們要維持自己的生活，必須保持社會的完整性。他們既不能強人不死，或是約定在同一社區裡生活的人一齊死，就不能不把死亡給予社會完整的威脅加以免除。這裡才發生了生育制度。」（頁十八）

在二十世紀分工已經細密的社會裡，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一個公民，如要維持自己的生活，必須保持社會的完整性。但在初民社會之中，在歷史上很多國家的社會裡，很多人所關心的，不是社會的完整性，而是個別家庭的連續性。家庭是分工合作的單位。在一個家庭之中，不但有兩性的分工合作，而且有世代的合作。這種經濟單位的自給自足性，是很高的。在這個家庭裡，每個人所最關心的，不是社會上任何個人的死亡，而是家庭份子的死亡，中國社會中流行着一句俗語，就是「養子防老」。養兒子的作用，等於近代工業社會中的老年保險。「老年妻子」對於老年人的威脅，等於工業社會中保險公司的破產。從個人的觀點去看，不從社會的觀點去看，撫育子女，實可收難待老年生活的效果。個人所以需要生育制度，就是因為「老」與「死」不是同時在人類的經驗中出現的。老的經濟意義，就是喪失了工作的能力，而死的意義，則是喪失了生命。在已老未死的一階段中，老年人需要侍養，家庭是老人得到侍養的一個最可靠的保障。在工業革命以前，還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代替這個功能的。所以從個人的立場去看，從免除老年生活上的威脅去看，也會發生生育制度。我所以認為此說，是要強調生育制度的產生，為要分擔個人的私願的，而不是全由社會安排出來的。

因為有這些看法的不同，所以我就不同意于作者的損己利人的生育論。（頁二十二—十五）作者說：「生育既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若是社會不把這件事作爲道德性的責任，社會完整也就缺乏了保障。誰不願把這責

任讓別人去擔負，自己變成遊戲的逍遙于爲子女做犬馬的劬勞之外。」（頁一七二）作者又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說明社會會促進繁殖的「助人」子女。「在南美的某一個村子里，每王有一個妻子，凡是結了婚不生孩子的要罰酒飲，若是斷了還不生效力，就得把不盡責的男子，按住地下打屁股。結婚不是私事，生育也是一項社會分子的天職。」（頁一七三）假如生育真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恐怕不但是真的，得按在地下打屁股，大約全國任何縣份的人民，都有挨打的能力。但是在別的地方，很少聽到有採用這種辦法的必要。反是，送子觀音普渡前的香火，倒是在很多鄉下都可以看到的。假如人們必須聽社會的督促，才肯負起生育子女的責任，為什麼有這樣多的善男信女，乞靈于觀音大士之前？

假如照我上面所說，生育子女的人，有他那種自私的，經濟的打算，那麼生育制度的存在，就非得到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除了經濟的原因以外，我們也不可忽略宗教原因，在生育制度中，過去也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而使種族的綿延，得到更長久的保證。現在還有許多許多人，相信死後的靈魂，需要子孫的祭祀，然後才可保證在另外一個世界，不過孤苦的生活。假如一個人在死去時沒有生育子孫，他就變成一個「若教氏之鬼」，也就是一個餓鬼。不但他自己挨餓，連累了他的祖先，也會挨餓，所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經濟的動機與宗教的動機，都可以使大多數的人，把生育子女，看作一種利己而非損己的工作。人類所以能够繁衍到今，不就是重要的原因。

三 婚姻與家庭向何處去？

二十世紀是一個變動的大時代，一切都在變動，婚姻與家庭自非例外。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婚姻的基礎在家庭，所以我們先從家庭說起。作者在本書結尾時曾說：「家庭雖則也是吸收了很多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但凡他有一個基本的撫育作用守得住，雖則其他功能已經逐步移了出去，他還是能存在」。（頁一九九）可是我們看到生產發達的國家中，這個撫育的功能，已有爲政府逐漸的把他的撫育功能，移給別的社會機構了。

取而代之之勢。以生育子女的責任而言，過去可以說是完全放在父母的身上，現在則政府也括足來分擔這種責任了。法國政府，在一八六〇年，就開始了子嗣獎助金的助勞之外。」（頁一七二）作者又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說明社會會促進繁殖的「助人」子女。「在南美的某一個村子里，每王有一個妻子，凡是結了婚不生孩子的要罰酒飲，若是斷了還不生效力，就得把不盡責的男子，按住地下打屁股。結婚不是私事，生育也是一項社會分子的天職。」（頁一七三）假如生育真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恐怕不但是真的，得按在地下打屁股，大約全國任何縣份的人民，都有挨打的能力。但是在別的地方，很少聽到有採用這種辦法的必要。反是，送子觀音普渡前的香火，倒是在很多鄉下都可以看到的。假如人們必須聽社會的督促，才肯負起生育子女的責任，為什麼有這樣多的善男信女，乞靈于觀音大士之前？

假如照我上面所說，生育子女的人，有他那種自私的，經濟的打算，那麼生育制度的存在，就非得到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除了經濟的原因以外，我們也不可忽略宗教原因，在生育制度中，過去也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而使種族的綿延，得到更長久的保證。現在還有許多許多人，相信死後的靈魂，需要子孫的祭祀，然後才可保證在另外一個世界，不過孤苦的生活。假如一個人在死去時沒有生育子孫，他就變成一個「若教氏之鬼」，也就是一個餓鬼。不但他自己挨餓，連累了他的祖先，也會挨餓，所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經濟的動機與宗教的動機，都可以使大多數的人，把生育子女，看作一種利己而非損己的工作。人類所以能够繁衍到今，不就是重要的原因？

作者似乎不相信有這一個可能。他說：「社會共同來經營集體撫育的方式，爲了些我們還不太明白的理由，好像還不太成功。在撫育作用採取集體負責的原則，在現代社會裡，祇有部份的實行，好像是現有的學校，祇有部份的實行，好像是現有的學校，祇有部份的實行，也是花在別的社會組織中的時間多？他所得的養育，是來自家庭中的佔大部份呢，還是來自別的機構中的佔大部份？仔細的計算一下，我們不得不承認，家庭已將大部分的他的撫育功能，移給別的社會機構了。

婚姻的一個重要基礎，既然是家庭，則家庭變動，必能的影響到婚姻。這種影響，已在許多地方表示出來。在初民社會中，不結婚的男女是例外，而這一類的人，在近代社會中常見，此其一。結婚之後，不生子女的，逐漸增多，此其二。婚姻以外的生育，所謂私生子，在許多國家中，已成了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此其三。由於禁止幼工律，及老年保險律，子女已失其經濟的價值，因而生育子女的願望，逐漸降低，此其四。由於節育方法的普及，使許多國家的生育率，在過去一百年內，有每況愈下之勢，此其四。也許由於節育方法的利用，還沒有吞一粒丸藥那樣方便，也許真如衛司脫麥克或麥克獨（W. Mc Donald）之所說，人類有愛好子女的天性，所以生育就是在經濟發達的國家中，也還未斷絕。但是婚姻與生育，在若干人的心目中，是可以分開的，則是事實。假如像作者在書中所說：「婚姻是社會為孩子們確定父母的手段，從婚姻裡結成的夫婦關係，是從親子關係上發生的」，（頁三十）那麼不預備生育子女的婚姻，其穩定性是大可懷疑了。事實已經證明，沒有子女的婚姻，其分離的可能性，三四倍于有子女的婚姻。

婚姻的經濟基礎，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在初民社會以及農業社會中，不管是男耕女耕，或男耕女織，夫妻分工合作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在這種合作的情形之下，雙方如有一方離開這個經濟單位，生活就要破壞。這種休戚相共的經濟關係，把婚姻結合得如膠似漆。但在

在近代社會中，家庭已經不是一個生產單位。男女合作的對象，已經不是夫或妻，而是整個的社會。起初是男子的後塵，參加社會中的生產。起先是生產功能脫離了家庭，逐漸的消費功能也脫離了家庭了。起初是家庭只有一本賬簿，逐漸的夫或妻在銀行中各人有各人的戶頭。這種在經濟生活上已經脫離關係的夫妻，想維持長久的關係，是困難的。事實已經說明，在都市中的婚姻，其分離的可能性，大於鄉村，就是因為在都市中，婚姻首先擺脫了經濟的意義。

婚姻如失去家庭及經濟的基礎，事務性的關係來維持，是極其困難的。人類的性關係，最近才有人開始作科學的研究，但在廣闊國地之中，我們的知識是有限的。德米頓（G. V. Hamilton）台羅斯（K. B. Davis）迪克森與畢姆（R. L. Dickson and L. Beam）其所研究的對象，少的只有幾百人，多的也不過一千餘人。最近印第安那大學的金瑟教授（A. C. Kinsley）及其同事，在國家研究委員會的鼓勵及羅氏基金的協助之下，才發願於二十年之內，調查十萬個男女及青年的性生活。現在為止，他已調查過一萬三千人的性生活。根據初步的報告，美國十二歲的男孩，已有百分之五，有過性的經驗。十三歲的男孩，七人中有一個人，已有此類經驗。二十歲以下的男子，有百分之七十三，在結婚以前，即有性的經驗。此種習慣，與教育程度似有關係。小學未畢業的男子，有百分之九十八，在結婚以前，即有

性的經驗。受過中學教育的，婚前有性經驗者，即降至百分之八十四；受過大學教育的，婚前有性經驗者，更降至百分之六十七。結婚之後，在婚姻關係以外滿足性的對象，已經不是夫或妻，而是整個的社會。起初是男子的後塵，參加社會中的生產。起先是生產功能脫離了家庭，逐漸的消費功能也脫離了家庭了。起初是家庭只有一本賬簿，逐漸的夫或妻在銀行中各人有各人的戶頭。這種在經濟生活上已經脫離關係的夫妻，想維持長久的關係，是困難的。事實已經說明，在都市中的婚姻，其分離的可能性，大於鄉村，就是因為在都市中，婚姻首先擺脫了經濟的意義。

在婚姻的三個基礎，都開始出現動搖的時候，近代的男子，於是想把婚姻關係，建築於一個新的基礎之上，此新的基礎，即俗所謂戀愛，其功能即在滿足感情生活。何謂戀愛？作者曾請教過一位美籍太太，怎樣去形容戀愛的境界，她說：「世界上的一切都好像不在念，連自己也在內，祇有他。」（頁六四）作者根據這個定義下一個論說：「這個形容若是正確的，則可以說戀愛和考慮正是相反的。因之，我們若要成年人自主婚姻，以戀愛來代替考慮，婚姻就會美滿，似乎很成問題了。」（頁六四）其實，事實已經證明，如把婚姻建築在戀愛的基礎之上，婚姻婚姻是極不穩定的。好萊塢的婚姻，都是建築在戀愛的沙灘上的，他們最後的歸宿，好像是在銀河（Reno）離婚市。

家庭在變，婚姻也在變，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誰都不能預言。但作為一個制度看，他正如私有財產制度一樣，好些人以為他是永存的，那知在轉眼之間，他已變了花樣了。

本刊編輯部啓事

(1) 本刊暫時專論、通訊、文獻、辯論、論壇，我們的意見，書評，讀者通訊等欄，每欄均歡迎投稿。

(2) 本刊對於通訊一欄，希望盡充實，希望各地讀者合作，從全國各地給我們以該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真實的報導。每篇通訊，以二千字至四千字為合適，特別歡迎新聞、長寧、天津、西安、開封、蘭州、廈門、安慶、蚌埠、漢口、宜

昌、重慶、成都、貴陽、昆明、福州、廈門、長沙、衡陽、香港、台北等地讀者貽稿。

(3) 決定採用之稿，立函寄報稿費。稿費按每千字每頁計算，每千字自貳元至貳元五角，依主計處每月公佈的各地生活指數計算。

(4) 本刊各欄，除專論、論壇，及我們的意見，一律用真姓名發表外，其他用筆姓名或筆名，聽作者自便。但文責一律由作者負責，作者並須以真姓名通知本刊。

附錄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初步主張

(甲) 政治方面

(一) 我們的基本政治主張，是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二) 法治必須代替人治，因制導人，而不因人設制，執法與制法並重，憲政尤重於憲法。(三) 公務機關，其於法定範圍內，應有其獨立地位，並對人民負法律責任。(四) 文官制度必須確立，除政務官外公務機關人員不得作政治活動。

(五) 軍隊屬於國家，以防衛國家為職務，軍人不得干涉政治。軍人從政，應先放棄軍人身份。(六) 民主制度必基於政黨組織之運用。國內應有並立的政黨，互相批評與監督，並各致力於爭取民意的支持。政府不得假借任何口實，施用暴力壓迫異己，民意的最後表現為選舉，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的結果而定。

(七) 選舉應以區域為單位，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負責行使政權。(八) 地方自治之基本原則，應由憲法加以保障。凡地方自治事項，中央僅能在法定範圍內行使中央監督權。(九) 民主政治，不應只重形式，並應注重行政對於大眾所發生的實惠。我們所要的民主政治，應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與權利，務使免於恐懼，免於匱乏，免於驅迫，免於剝削。

(乙) 外交方面

(十) 我們主張以內政的協調，謀外交的協調。(十一) 積極推行睦鄰政策，建樹獨立的對外國策。(十二) 反對種族歧視，支持弱小民族，尊重其獨立意識。(十三) 反對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國際紛糾，應依據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以和平方式解決。我們贊成裁減軍備，並樹立國際管制制度，同時擁護健全的國際組織，使其成為真正解決國際衝突的機構。(十四) 贊成國際經濟文化合作，及國際經濟文化機構的樹立。(十五) 反對任何政府或某團體統管論，從而造成國際間宣傳攻勢，妨礙國際和平。

(丙) 經濟方面

(十六) 我們主張國家應籌劃妥善方法，負責發展國家資源，實現全民就業，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準。(十七) 國家應運用各種合理的政策，積極促進我國經濟的現代化與工業化

(十八) 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為最終目標。第一步應即

規定私人農地的最高限度，超過此限度者，應立即收歸國有。對於原來地主，給以長期償還，以為補償，收歸國有的農地，或租與自耕農，或集體經營，視情形而定。市地應立即收歸國

有，並酌予補償。(十九) 農業之生產經營及農民生活，應運用國家力量輔助其改進。(二十) 凡獨佔性及關稅性之工礦交通事

業，原則上應由國家經營。(二十一) 金融事業，應由國家經營

機構，(二十二) 國營事業，應以資源之充分與合理運用及健全

民之最大福利，為其經營方針。(二十三) 國家賦稅政策，應以

平均私人財富，創造國家資本，促進資源開發，維持經濟繁榮

，及達成社會安全為目標。(二十四) 國家對外貿易政策，應配合國內經濟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二十五) 歡迎不帶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國經濟政策的國外投資，在互惠的條件下，參加我國經濟建設。

發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

電話四二二五五五五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一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銷辦法：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及經售
批銷一律八折優待郵費外加外埠
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二、在預定期間不受中途刊費
加價之影響

三、本刊每逕星期六出版批銷
戶提前一日發貨每期十本起碼

四、寄送方法請來函說明

五、本刊售價暫定零售每冊三

萬元預定三個月如下表

三、掛號：四十二萬元

平寄：三十萬元

三、月 航空：五十八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六、本刊在上海北平兩地同時

發行凡華北區定戶請向北平本刊

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請向本刊上

海辦事處洽定